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铁托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铁 托 传

敬言 石肖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002
第二章	早期革命活动.....	036
第三章	与希特勒战斗.....	070
第四章	坚持独立自主.....	106
第五章	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129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1892年5月7日，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出生在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接壤的库姆罗维茨村里。现存的铁托故居门前的牌子上写着：“1892年5月25日铁托同志出生在这里。”英国传记作家菲利浦·奥蒂经过考证，在他所著《铁托传》中说，铁托生于1892年5月7日。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是铁托早年的战友，他写了一本《铁托内幕故事》也相信5月7日为其诞辰。但是，铁托的生前好友弗拉吉米尔·德迪耶尔在经铁托本人过目的《铁托传》中，却回避了具体日子，借铁托的话说：“1892年5月，我出生在克罗地亚地方的一个名叫库姆克维茨的村子里。”

布罗兹是个大家族，祖上就穷。约瑟夫的曾祖一辈，还是“扎德鲁加”制度下布罗兹家族的成员。再往上推，布罗兹家则是贵族埃尔多迪家的农奴。这“扎德鲁加”有点像中国的封建大家庭，又带有原始部落的遗风。它当时是克罗地亚社会的细胞。一个“扎德鲁加”之内，聚集着同宗的人。大家共同居住的是一所大房子，或者是房屋相连、组成一组的建筑

群体。每个“扎德鲁加”都有一个头头，是女的，称“族长”；是男的，称“老太爷”。这“族长”或“老太爷”，对一切事务都有决定权，尽管他们做决定前要与族中的头面人物进行磋商。“族长”或“老太爷”率领的人丁多寡不等，这要看家族兴旺的程度，少的两三对夫妇加上他们的子女，多的能到上百人。家族成员吃“大锅饭”，好年景自给自足。

到约瑟夫的祖父一代时，这种制度已全面瓦解。1853年，也就是约瑟夫出生差不多40年前，克罗地亚当局颁布法律，允许“扎德鲁加”分家。在此背景下，约瑟夫的爷爷马丁·布罗兹从“扎德鲁加”分了出来，自立门户。他还幸运，很快找到了一个名叫安娜·布拉日契科的农家姑娘，结了婚。但婚后马丁家庭负担很重。他自占的那点土地的出产无法养活老婆和他那7个孩子，于是，除干农活外，马丁不得不操起赶大车跑买卖的生计。他运送并贩卖各种货物，来往于家乡及萨格勒布、锡萨克等城市之间。1878年冬，也就是约瑟夫出生14年之前，马丁爷爷拉了重重的一车盐，路上，大车的一个轮子脱落，可怜的马丁被压在车下，受伤不治而亡。约瑟夫的爷爷死后，父亲弗兰约·布罗兹作为独子继承了父业。

继承这笔遗产未必是件好事。为了保全父亲的家业，弗兰约必须赎买6个姊妹应分的产业。不用说，

弗兰约欠了债。好在弗兰约这时还是单身。

他并没有干父亲赶车的活计。他除干农活外，要靠打柴给家里添点钱。但克罗地亚的树林属于领主私有，打柴人不能无偿地进行砍伐，哪怕是枯枝败叶也不成。斯洛文尼亚那边却是另外的章程，那里允许打柴人自由进入树林，尽管那里的树林也归私人所有。这样，这边的打柴人便进入那里的树林，把打的木柴运回来，卖给需要的农家。弗兰约就是这样经常进入斯洛文尼亚。

他去的是距库姆罗维茨 10 英里的波斯雷达村边一家的树林。树林的主人是马丁·亚维歇克。马丁·亚维歇克有 14 个孩子，大女儿叫马丽亚·亚维尔舍克。她高高的个儿，身材苗条，一头金发，还有一双碧蓝的大眼睛。有一次，马丽亚在路上碰上了弗兰约，从此两人相爱。在弗兰约 24 岁时，他们结婚。当时马丽亚 16 岁。她的陪嫁不少，但嫁妆是改变不了家境的。弗兰约家仍然很穷。婚后儿女不断增多，吃饭成为弗兰约夫妇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第一个孩子是马丁，他活了下来了。约瑟夫·布罗兹是第 7 个孩子，但他上边除马丁和德拉古丁外都没有活下来。他出生时，母亲马丽亚才 27 岁。她一生生了 15 个孩子，其中有 8 个在少年时夭折。

弗兰约好脾气，但性格软弱。贫穷把这个体格健

壮并长有鹰钩鼻子的外表坚强的汉子从精神上压垮了。一遇到难办的事，尤其遇到债主逼债，他就不胜其烦，往往借酒消愁，把家事丢下不管。马丽亚是坚强的，她也能干，勇敢地担起了操持家务的重担。

家里买不起小麦，马丽亚只好让丈夫去买玉米面，用玉米面包代替小麦粉面包。即使这样，马丽亚仍无法按每个人的食量把面包送到大家的嘴里，而只好“配给供应”。因此，储藏室总是上锁的。她有经验，只要有亲戚来访，孩子们就趁机向她要面包吃。当着客人的面，她无法像平常那么只给孩子一丁点儿。为了吃的，约瑟夫经常带头干一些让妈妈特别生气的事。有一次过节，父母去朋友家，孩子们饿了，弟弟妹妹哭着要东西吃，约瑟夫就把妈妈挂在屋顶的一个熏猪头放在锅里煮着吃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吃了个够。母亲回来发现了，约瑟夫他们不敢作声。马丽亚只是摇着头，说了一声“是留着过新年吃的呀”，事就过去了。

约瑟夫还算幸运，他的性格深受外祖父的喜爱，连他的外表也像外祖父。外祖父家比布罗兹家富裕，于是约瑟夫被接到了波斯雷达。马丁·亚维歇克是个快乐的老头儿。个子不高，但很健壮。他的和善劲儿是全村闻名的。他还特别喜欢孩子，爱与孩子们在一起，教他们必不可少的生产和生活知识，并跟着孩子

们开玩笑。约瑟夫得到了外祖父的厚爱。但是，外祖父并不宠他。约瑟夫也并不娇滴滴的以柔取悦于外公。他机灵、勤快，也很勇敢。约瑟夫小小的年纪，汲水、放牛、照料牲口、跟外公到山林里去烧木炭，什么都干。自然，干活是难不倒小约瑟夫的，他在家里从小就养成了干活的习惯。

不干活的时候，约瑟夫就到村外去玩儿。村子周围的树林是约瑟夫经常出没的地方。他在山林里感到十分舒心，他可以挑选树枝削成哨子，并剥下有韧性的皮编成赶马的鞭子。

约瑟夫很喜欢马。他长到刚刚超过马肚子高的时候，就学会了骑上没鞍的马。拉马套车已成了他的专长。他有经验：对马越好，马越听使唤。

约瑟夫刚过7岁就不得不回家了。可以说，他的快乐的童年从此结束。他回到家里之后，无论体力上还是精神上都变了一个样子。

在外祖父家他也干活，但那完全力所能及，回到家里就不成了。他差不多要整日到野外去放牲口。放牲口须看得十分紧，稍不留神，牲口就会跑到别人的田里去。他有时还要独自一个人推磨，单调地围着石磨转，一转就是一天。干完了活儿，往往是一身大汗。这是在外祖父家从来没有过的。

最使约瑟夫感到难办的倒不是干活，而是替父亲

到村子里的人家中去借债。小约瑟夫不但要不能争辩地去看某些人的难看的脸色，还要无言地倾听某些人的无端咒骂。

精神上的压力还来自别的方面。一年的冬天，家里又缺米又没柴。父亲无奈，决定把家中名叫波拉克的牧羊狗卖出去。价钱并不高，只够换两捆柴。可波拉克是孩子们喜欢的伙伴。小约瑟夫跟波拉克的关系尤其不寻常。当约瑟夫只会爬不会走时候，波拉克就总是偎在他的身边。他学会了抓住波拉克长长的毛，蹒跚地站起身来。每当这时，波拉克就在屋里小心地慢慢走动，带动约瑟夫学迈步。小约瑟夫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但父亲执意不留。父亲也许没有错。他得想法让家里的灶中生起火苗，把炉子里的面包烤熟。大家哭了，约瑟夫哭得尤其伤心。他第一次懂得了，为了活下去，必须舍弃心爱的东西。

父亲把波拉克送走了，去拿它换回那两捆柴。但去不多时，在父亲还没有回来之前，波拉克在门口出现了。大家又惊又喜。原来，父亲把波拉克交给那家人之后，波拉克自己跑了回来。孩子们喜出望外，赶紧把波拉克藏在村外的一个树洞里。大家偷偷去喂它，这样过了两个星期，不见那家人有什么动静，孩子们才把波拉克放了出来。好在那家人一直也没有追究。这样，波拉克又留在布罗兹家了。

学校就在他家的附近。尽管村民认为上学没有用，不如在家种地，但学校仍然办得十分兴旺。库姆罗维茨全村才200户，但学生就有350名。当初，父亲并不同意让约瑟夫进学校，由于儿子的一再请求和坚持，父亲也就同意了。

学校生活是约瑟夫童年的一个新阶段。学校只有一名教师，但却开了好几门课程。在学校里，约瑟夫学到了崭新的知识，结交了新的朋友，打下了他走向社会、走进世界的重要的生活和知识基础。

约瑟夫毕业了。他先是到舅舅家呆了一段，后来又回到了家里。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名叫朱列加的人。他从军队那边来，是个上士。他喜欢上了约瑟夫，起劲儿地动员约瑟夫跟他一起走，进城去。他说约瑟夫应该到城里当一名侍者。他对约瑟夫说，侍者穿得好，整天跟上等的优雅之士呆在一起，有意思得很。

穿得好这一点又打动了约瑟夫的心。他永远不能忘记来村里的那位男爵。他不晓得男爵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名工程师。男爵身材高大，还有一辆汽车。每当男爵驾着汽车出现在村里时，孩子们总是围上去吵吵闹闹。大家并不尊重他，原因就是他的裤子有一块打补丁。孩子们暗地里笑他：“裤子上打补丁，跟我们穿的没啥两样，还算得上什么男爵哩！”

父亲对朱列加的主意不大热心。他已经把大儿子放走了，远走高飞去美国了。克罗地亚已经成千上万的人去了美国。他想让约瑟夫也到美国去。但是，一个穷农夫上哪里弄那么多的钱呢？无奈，父亲只好答应了约瑟夫的请求。

朱列加高兴地带约瑟夫离开了库姆罗维茨，把小约瑟夫投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时，约瑟夫15岁。

锡萨克处于三条河交叉口上。在罗马时代有13万人，是全省当之无愧的首府。它曾是抗击土耳其人的重要据点，在军事上颇为重要。皇家第十七近卫军团就驻扎在这里。

约瑟夫到锡萨克之后，按照事先的安排，先在他舅舅一个朋友开的饭馆当上了跑堂。他无法在铁路系统里立足，尽管他十分羡慕开动庞然大物的火车司机。

开始，约瑟夫过得很是愉快。饭馆的院子里有个花园，旁边还有一个柱球场。晚上，电石灯把柱球场照得亮如白昼，吸引着第十七近卫军团的官兵和其他的人前来就餐、打球。吃饭时，这里还有乐队进行演奏。那优美的音乐声，约瑟夫在家乡从来没有听到过。

约瑟夫很忙，很累。他不但要侍奉客人，还要洗碗碟，刷桌椅，收拾打柱球用的桩子。他差不多总是第一个到来，最后一个离去。尤使他受不了的是他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学习。渐渐地他对自己的第一个职

业感到了失望。

不久，约瑟夫认识了尼古拉·卡拉斯的几名学徒。尼古拉·卡拉斯是锡萨克有名的锁匠。他的工厂有一两名师父，三四名学徒。这在锡萨克已是一个“大”的工厂了。

尼古拉·卡拉斯的工厂吸引着约瑟夫，他通过认识那几个学徒找到尼古拉·卡拉斯，尼古拉愿意收约瑟夫为徒。约瑟夫按尼古拉的要求，请父亲来为他办了入厂手续。他们谈妥由家里供约瑟夫衣着，由师父供约瑟夫食宿。

这样，约瑟夫便开始了为期3年的学徒生涯。工厂设在地窖里，厂房共两间，里面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桌子上有个巨大的铁砧。冬天，学徒们就挤在作坊里的那张长桌上过夜，夏天，他们睡到院子里去。学徒们工作近12小时：早上6点钟上工，下午6点钟收工。中午吃一顿午饭，饭后立即干活。饭的质量还是好的。早晨是牛奶和咖啡，还有可值3分钱的面包。使约瑟夫最感到满意的，是他又有了学习的机会。城里有一所徒工学校，开设地理、历史、语文以及其他一些课程。每周教师讲授两次，每次是晚上5点至7点。约瑟夫参加了学校的学习。

教师有好几名，校长名叫弗都·凯费尔贾。他和蔼可亲，深得学生们爱戴。有一名教师叫弗里克斯·

德斯波特，十分严厉，学生们都不敢与他接近。起初，约瑟夫也不喜欢他，并且断定他是一个不会笑的人。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约瑟夫的看法。有一次，约瑟夫在坟地里看到了他的这位教师，见他趴在一座坟上，跟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教师没有看到约瑟夫。原来，德斯波特结过婚，他的妻子在生孩子时死去了，教师从此就失去了欢乐。知道这件事后，约瑟夫便尊敬起这位教师来。

也有令人讨厌的教师。对这类教师，学徒们就喜欢找机会整整他。有一次约瑟夫为此捅了一个漏子：在愚人节那天，他要整整一位令人生厌的教师。他在那位教师常坐的黑椅子上洒上了墨水。然后躲在一边，静观自己恶作剧的效果。但是，校长走了进来，校长穿了一条雪白的裤子，不由分说一屁股就坐在了那把椅子上。约瑟夫惊呆了。他承认自己干了错事。校长弗都·凯费尔贾保持了他的本色，他一点也没有发怒，也没有对约瑟夫进行处罚。

约瑟夫平静地在工厂里度过了将近3年。在他学徒将要期满时，生活却变得不平静起来。他们对读书有极大的兴趣，但有限的时间无法满足大家强烈的读书欲望。于是，他们想出了利用上工时间进行阅读的办法：由一人朗读，大家听。朗读时，派一个人在门口“放哨”。见卡拉斯出现，就做个信号，叫里面停

下来，继续干活。朗读的差事一般由约瑟夫充当。有一次约瑟夫在给大家朗读福尔摩斯侦探的精彩片断。“岗哨”已然派出，但执勤者被故事所吸引，失了职守，没有发现卡拉斯走进了作坊。卡拉斯进来之后，径直走到了约瑟夫的背后。约瑟夫回头看见了卡拉斯，不觉大吃一惊。他急忙放下书本去干活。慌乱之中，新的车刀清脆地响了一声，断在了机台上。卡拉斯勃然大怒，伸手在约瑟夫的脸上打了一掌。

这一掌使约瑟夫难堪非常。他认为自己无法呆下去了，于是决定逃走。约瑟夫逃走了，他在一家砖厂找到了工作。

学徒出逃是有罪的，卡拉斯不得不向当局报告。宪兵把约瑟夫抓进了监狱。这是约瑟夫第一次进监狱。

卡拉斯是个好心肠的人。他到狱中给约瑟夫送饭，并且东奔西走，想法让约瑟夫出狱。尽管约瑟夫坐了牢，他仍承认约瑟夫这个徒弟，并且让他满期出了师。在出师前，约瑟夫被允许独立完成一项作业，为锡萨克地方法院制造了楼梯上用的铁栏杆。

在工厂学徒的后期，约瑟夫生平第一次接触政治活动。工厂有一名工匠，名叫施米特。他从萨格勒布来到卡拉斯的工厂。他总是围着一条惹人注目的红色围巾。他向学徒们讲世界上各式各样新奇的事。他可以引人入胜地讲人类发现彗星的故事，讲新近发现了

什么样的彗星；他向大家讲飞机制造和试飞的生动情节，尤其是对飞行家法曼的事迹，讲得绘声绘色。而对学徒们来说，最令人激动的，是他讲工人自己斗争的故事。

施米特成为约瑟夫第一位政治启蒙者。不多久，施米特不得不离开约瑟夫他们而远去了。接替施米特的，是格斯派列奇。

格斯派列奇比施米特更富活力。他身体强健，性格好斗，并以此要求学徒们。他很快教会了大家希腊式的摔跤。最为重要的，是他实地进行着政治性活动。他同一些进步的工人一起酝酿组织工会的事，而工会当时是被禁止的。为此，他经常与志同道合的人，在“猎人之号角”啤酒店里集会。学徒是不被允许进入啤酒店的，但约瑟夫是个例外。卡拉斯喜欢约瑟夫。他经常派约瑟夫到啤酒店去取他喝的啤酒。这样，约瑟夫就有机会看到格斯派列奇等人的集会，并听到他们讨论的内容。在啤酒店里集会，得买酒店的酒，不然，老板就赶他们出来。但买了酒就要喝，而一喝，大家就现出了醉意，因而无法进行深入的讨论。在此情况下，格斯派列奇便想出了修建工人之宫的主意。

造一所房子在锡萨克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于是，一座“漂亮”的“工人之宫”拔地而起。从此，工人们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学徒们也可以自由出入，不

受限制了。

格斯派列奇还特别注意教育学徒们做一些实际工作。约瑟夫在学徒中对格斯派列奇布置的任务做起来最为认真。替社会党出版的报纸《自由之言》募捐、推销“工人火柴”，约瑟夫总是成绩卓著。格斯派列奇还注意向学徒们进行宣传，让大家读进步作家爱德华·贝拉米所著《向后看》，以及《自由之言》等。当时，俄国出现了对革命党的迫害，日本天皇将12名社会党人判处死刑，美国的革命党人则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这些消息，格斯派列奇都及时地向约瑟夫等人做了宣传。他尤其注意向大家进行现实的斗争形势的宣传，鼓动大家起来为维护工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这时，约瑟夫18岁。离开锡萨克后，约瑟夫到了萨格勒布。萨格勒布是克罗地亚最大的城市，也是约瑟夫生来所见到的最大的一个城市。与锡萨克相比，这里的工厂现代化得多。这一点，对约瑟夫很有吸引力。约瑟夫找工作也没费大的周折。因为他与曾在锡萨克一起干活的朋友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约瑟夫进入一家工厂。这次，他在萨格勒布没有呆多久，只有两个月，但是这两个月却是约瑟夫终生引为骄傲的：他第一次直接参加了政治活动——“五一”节游行，并参加了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很多年后他还

记着当时发给他的党员证和证章的样子。

在工厂里，约瑟夫还掌握了比锡萨克更精、更深的劳动技术。这一点使约瑟夫终身受用。约瑟夫的工资是每天两克朗又30赫拉。他日常生活有了保证，并有了积蓄：攒足了钱，花30克朗在服装店挑了一身新衣。

他要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回家去一趟，让乡亲们瞧一瞧。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他把新买来的衣服放到住处，去向工友们告别。但等他返回时，不觉沮丧万分：他的新衣不翼而飞。手头还有一些克朗在，回家的计划不改变。他只得又花4克朗在旧衣店购得一身衣服。无论如何他约瑟夫不会穿着上工的那身脏破的衣服去见家乡父老的。

12月，约瑟夫回到了家乡库姆罗维茨。他的衣着依然十分显眼，尤其心里感到踏实的是，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自食其力的人了。不用说，带回来的送给父母和亲友的礼物，也会引起约瑟夫自豪感。

约瑟夫陶醉了。他在家乡呆下去，丢开了离别家乡重返城市找工作的打算。晚上，他与邻居们围坐在火炉旁，直到深夜。上了年纪的人讲着马蒂亚·古贝奇的故事，老婆婆们则把一个在拿破仑败退时留在村里的伤兵的故事说个不停。年轻人讲述他们春天外出旅行的经历，约瑟夫则向大家介绍自己在外谋生的种

种轶事趣闻。日子一天天过去，口袋里的克朗一个个减少。

约瑟夫这才决定再次离家。他先到了卢布尔雅那，但那里没有地方收留他。他又到了的里雅斯特，步行了足足60英里。

的里雅斯特的港口码头和巨大的远洋船只令约瑟夫兴奋不已。但这里也没有约瑟夫的容身之地。他幸亏是名工会会员，得以领取失业救济费，不致填不满肚子。

这样，约瑟夫又一次出现在库姆罗维茨，回到了家乡。对此，大家十分惊讶：这么快又回来了？

约瑟夫理解乡亲的反应。因此，他下定决心，再次离家到外面去闯荡。他又到了萨格勒布。

这次他遇到了机会。他碰到一个名叫克纳乌斯的师傅。克纳乌斯开了一个机械修理厂，约瑟夫被接纳进厂。

克纳乌斯与约瑟夫很谈得来。约瑟夫也得到了较为满意的报酬。他又有了积蓄。约瑟夫没有忘记工会组织的好处，他交足了欠下的会费。

这一年，约瑟夫参加了“五一”游行，并且加入了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人行列，尽管他跟老板的关系不错。

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工资得到了增加。约瑟

夫并不想在此久呆。他要到各地去闯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克纳乌斯，克纳乌斯十分赞成约瑟夫的想法。

约瑟夫离开了萨格勒布，他的目标是维也纳。但中途约瑟夫改变了主意，决定在卢布尔雅那下车碰碰运气。约瑟夫在卢布尔雅那附近的小镇卡姆尼克的一个五金工厂找到了工作。这个工厂约有工人150名。这时，约瑟夫参加了带有政治色彩的体育组织。体育一直是他喜爱的活动。但没多久，约瑟夫所在的工厂破产了，大批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

工厂经理把大家召集起来，对大家说，他了解到，波希米亚的伊内曾科维的一家做保险柜的工厂在招收工人。如果大家愿意去，他可负责介绍，并且答应每人发给路费100克朗。

50名工人当场答应愿意前往，约瑟夫也是其中一个。

他们上路后取道维也纳前往波希尼亚。到达波希尼亚车站后，大家发现车站上聚集着大批的工人，他们正在罢工。大家明白了，他们受了骗，100克朗几乎使他们变成了罢工的破坏分子。50人立即加入了罢工工人的行列，罢工取得了胜利。工人们增加了工资。从斯洛文尼亚来的50名工人不但得以受雇于保险柜五金厂，而且也增加了工资。

但是，约瑟夫下定决心，这次要在欧洲大陆各地走走。他先到了比尔森，接着到慕尼黑，后又到曼海姆和鲁尔，最后到达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得以与哥哥马丁重逢，并在哥哥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新的工作收入不多，他无法支付进入咖罪店的费用。想听维也纳音乐时，他也只好靠在露天饭店的栏杆上欣赏。但收入可支付入体育协会接受训练的花销。他练习了击剑，这使他在日后的军旅生活得益匪浅。他也学会了跳交际舞。

1913年，约瑟夫年满21岁。按规定，他要到帝国军队服兵役。为此，他离开维也纳，回到萨格勒布。

服兵役对约瑟夫来说是不得不接受的差事。他早有耳闻，帝国军队是一支老式的、古板的队伍。军队为操练而操练，而不是为了打仗而训练。另外，军队里的等级制度也是令人窒息的。

入伍的第一天，班长就给了约瑟夫一个下马威。班长见到约瑟夫留的那一头漂亮的头发后说：

“社会党人先生，到这里来，我替你好好地理发。”

说着，他笨拙地按动推子。不一会儿，约瑟夫的头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十”字。班长故意停下来欣赏了一会儿，便命人把约瑟夫的头发推了个精光。接

着，班长告诉约瑟夫，必须记牢王室成员的名字。

很快，约瑟夫发现，他们的班长简直是一个恶棍。这位班长对谁都可施加他的淫威，而任何人只得默默忍受。因这是军队，所有的士兵对班长必须绝对服从。

全班30人睡在一个房子里。班长喜欢抽烟，每当他拿出烟时，30人必须争先恐后来为他点烟。他喜欢这种场面，谁的动作慢了，谁就要挨罚。而罚罪的方式花样翻新，奇特无比。约瑟夫看到，有一个士兵因动作慢，被命令从外边捉一只青蛙来，班长拿粉笔在地板上画一个圆圈。让那位士兵把青蛙放在圆圈之内，那士兵必须死死地盯住那只青蛙，不许青蛙跳出圈外。

来自约瑟夫家乡库姆罗维茨村的一个朋友，没有念过书，因此，在规定的时限内未能记牢王室人员的一长串名字而受到处罚。天才的班长又想出了新的方式：命令这位士兵爬上屋里用瓦片砌成的炉子，老老实实蹲在那里，用手指着自己的前额，嘴里不停地骂自己：“我是个笨蛋！我是个笨蛋！”

就这样，这位士兵足足被折磨了一个钟头。爬下来后约瑟夫陪他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他在那里大哭起来，却又不敢放声。

在军队里，对约瑟夫来说唯一的乐趣是参加部队的体育活动。他的剑术颇有长进，他获得全团击剑冠

军。尔后参加布达佩斯举行的全军击剑比赛，又获得亚军。很快地他被提拔为军士。这与他在体育上表现出来的才能不无关系。

约瑟夫在军队生活了一年多。这时，重大的事变正在悄悄走来。

1914年6月28日傍晚，战士们听到了全连紧急集合的号声。大家在营房前的操练场上集合完毕，等候上司的训令。

团长出现了。他忧郁的神情丝毫不加掩饰。他向全连宣布的是一条在他看来极为不幸的消息：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西期·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对于斐迪南大公，战士们是知道的。因为每个战士一入伍，受的教育之一，就是熟记一长串王室成员那长长的名字，弗朗西斯·斐迪南就在这名单之中。

队伍解散后，战士们便开始用胳膊相互轻轻撞击。这是战士们的一种表达方式，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相互明白这一动作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

第十五莫多兰团是由克罗地亚人组成的部队。克罗地亚各地反对奥匈统治的浪潮，早已波及到这里。

大家明白，行刺事件是南斯拉夫人干的。奥匈方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大家倒希望事情会引发点什么，或者引发战争。那倒是个好机会，打起仗来，说不定

自己的国家会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战争果然来临了。行刺事件发生之后的一个月，约瑟夫所在的连队又一次紧急集合。这一次听取的是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命令。原来，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的青年，革命情绪一日高过一日。这些青年已经觉醒。他们不但憎恶哈布斯堡王朝，而且憎恶这个王朝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制度。

这些革命青年已经组织起反抗王朝的秘密团体。“青年波斯尼亚”在这些团体之中最为活跃。这些团体认为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共同的，因此，彼此互相支持，互相鼓励。

当时主张实行易卜生的不断反叛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是生活的主要规律的思想家迪米特里耶·米特里诺维奇和弗拉迪米尔·切里纳，成为青年精神领袖。而俄国民粹派的民思潮、蒲鲁东主义，在他们当中也颇时兴。

他们崇尚不妥协的精神，同时崇尚暴力，而他们认为暴力之中，暗杀手段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这些青年人很是勇敢，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只可惜，他们的劲儿用得不是地方。

维也纳为了“寻找充分的证据”曾派了特使到萨拉热窝去进行“调查”。谁知派出的特使并没有照政府的意图行事。这位特使名叫弗里得里希·冯·维兹

内。他所尊重的只是事实。他了解到，刺客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在行事前确是由贝尔格莱德进入波斯尼亚的，但这不能说明实质问题。特使没有发现刺杀事件得到了塞尔维亚当局的支持的任何证据。7月13日，他起草电报给维也纳。电报说：“不存在任何证据表明塞尔维亚政府对于组织谋杀或者提供武器等方面负有责任。也没有任何证据使人对这样的事情产生怀疑。”

不用说，电报使维也纳大为恼火，他们干脆不再理睬调查的事，而是直接下结论说：“行刺的想法产生于贝尔格莱德。”还说塞尔维亚的文武官员、“国防”组织的成员“向刺客提供了武器”，而塞尔维亚边界部门负责人则“把刺客们送进了波斯尼亚”。

事实上，当时塞尔维亚当局是竭力想避免与任何外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的，更何况是强大的奥匈帝国？两次巴尔干战争使塞尔维亚已经杀得精疲力穷。它的兵员已深感不足，武器也已耗尽。即使编制不足额的军队，武器也极为不足。当时枪就少10多万枝。由于大家忙于战争，经济也比邻国显得落后了。

还有一个原因，说明塞尔维亚政府不会与行刺事件有关：国内正准备大选。各政党都在忙于竞选活动。没有任何政党想借助于对外扩张来拉选票。如果事件果真是塞尔维亚方面组织策划的，它也不会选择这样的时机。事情正好相反，塞尔维亚政府由于害怕出事，

曾进行了若干防范措施。

奥匈及德国方面却不按事实说话。事发后，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康德拉宣称：“这不只是一个狂热之徒犯下的罪行，这次行刺是塞尔维亚向奥匈宣战……如果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帝国将面临南斯拉夫的、捷克的、罗马尼亚的和意大利的野心的大爆发……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奥匈必须打这一仗。”

差不多整个奥匈帝国的统治阶级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兹尔在给维也纳的报告中也说：“行刺事件使我们在道义上处于有利地位。”于是，帝国加紧进攻塞尔维亚的准备。但做法上“内紧外松”。一向持“主战”观点的总参谋长康德拉离开维也纳，宣布去凉快的地方“避暑”。

7月23日，维也纳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照会。

这是最后通牒！帕楚博士决定赶快召集内阁会议。首相尼古拉·帕希奇与参谋长拉多米尔·普特尼克缺席。

“只有拼死，别无他途！”教育大臣留巴·约万诺维奇首先开腔。其他政府成员没有不同的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帕楚博士以政府的名义，通报全体驻外机构，说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塞尔维亚将投身于战斗。

说来也巧，这时，各友好大国的使节没有一个呆

在贝尔格莱德，尤其俄国、法国和英国，使馆只有低级别的外交官在主持馆务，但帕楚博士还是把塞尔维亚政府的基本立场告诉了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

第二天，也就是7月24日，帕希奇被召回贝尔格莱德。他也主张不接受奥匈的最后通牒。他当天清晨去了俄国公馆，随后会晤了英国代办。他还召见了黑山和希腊公使。

摄政王亚历山大向俄国沙皇及意大利国王发出了个人呼吁。当天，俄国政府开会研究局势，决定在面對奥匈的四个军区实施动员。

塞尔维亚政府发出疏散令。同时，帕希奇在和阁员们一起绞尽脑汁，起草对奥匈照会的复照。

7月28日，即刺杀事件过后1个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宣战是通过电报的形式宣布的。

当天中午，尼古拉·帕希奇正在尼什一家咖啡店里吃午饭。他独自占着一张桌子。一名宪兵给他送来一份电报。帕希奇还没有吃完饭。看完电报，他站起身来，向在场的人宣布：

“奥地利向我们宣战了，它就要灭亡了。上帝将赐我们以胜利！”

8月，德、俄、英、法等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进攻贝尔格莱德的战役中，奥匈帝国陆军第二

军奉调进驻贝尔格莱德以北的阵地，作为后备部队。约瑟夫所在的第二十五莫布兰团也在其中。约瑟夫没有加入与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人的相互肉搏之中。他所在的第二军，因东部战线吃紧，被调往喀尔巴阡山，去抵挡俄国人的攻势。那是深秋，现在已是春天了。但天还是那么冷，还下着雨雪。战士们的大衣全是蓐麻的，无法抵挡寒风和雨水，靴子也全是破的。大家都无情地诅咒天气的恶劣，并使劲儿在跺着双脚。

约瑟夫将身子蜷曲在战壕里，尽可能使自己少一点接触外面的风寒。他诅咒的不只是恶劣的天气，他诅咒战争本身。他看到，对战争抱反对态度的不止他一个人。他不能忘记，在来前线前他坐禁闭的事。那时他就诅咒了战争。有一次，他当着别人面曾说他盼着帝国在战争中失败，盼着帝国早日瓦解。

另有一天，约瑟夫接到命令，要他前往诺维萨德取家住在那里的几个军官的东西。他晚上在马尤尔村过夜，住在一家水果蔬菜店里。老板娘是位塞尔维亚妇女。与约瑟夫一起在此过夜的，还有过路的另外几个士兵，其中有一名年老的军士长。约瑟夫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反对一切的民族迫害，因此，他谴责对塞尔维亚人的这种迫害。约瑟夫还说，他咒骂战争。自己的团要开往波兰的加利西亚，而到了那里，他要向俄国人投降。

在场的军士长听了约瑟夫的话之后咆哮起来，他立即解除了约瑟夫的武装，并将约瑟夫捆了起来。

这样，由于老军士长的告发，约瑟夫被送进了佩特罗瓦拉丁城堡的监狱。监狱里关着一名德国兵。那人已被关了两个星期。他说他被关后，再也没有人来理睬他。

约瑟夫听了之后受到启发，他不能被关起来没人理。于是，他开始用拳头捶门，闹着要去见指挥官。他的这一手很奏效。第四天，他被带出监狱。幸运的是，他被无罪释放。原因是指挥官相信了约瑟夫朋友的证词。城堡司令向马尤尔村那位水果店的老板娘进行了调查。老板娘与司令是老相识，老板娘晓得约瑟夫那几句话的份量，她还认定约瑟夫是替她们塞尔维亚说话的。所以她作证说约瑟夫在她那里什么话也没有说。

于是，司令对约瑟夫说：“对不起，现在没事了。”

约瑟夫被宣布无罪释放。约瑟夫十分恼恨那个告密的老军士长。

他从大家对连长汤马塞维奇的态度中也看到了反战情绪。汤马塞维奇每天都向大家灌输为了皇上勇敢杀敌的话，他甚至对不听从的人采用极为严厉的手段进行惩治，但是，大家还是鼓不起劲儿。

他从连长的身上看到，对战士，对下属，光严厉、

不关心是不成的。约瑟夫已升任排长，他指挥着一个侦察排。对侦察，他是极有兴趣的。他带领全排深入敌后，摸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军情，抓了不少的俘虏。有一天夜里，他们袭击了80名俄国兵。俄国人没有设哨就睡起了大觉，80人都成了俘虏。

他干得很成功。秘诀是什么呢？他要精心地关照下属，尤其注意大家的口粮是否被克扣，注意他们脚下的靴子，注意给他们创造睡眠的条件。他还注意跟大家一起谈论共同的家乡，谈论大家的家人……大家信任他、拥护他。

从对面山上发射的第一发炮弹落在离约瑟夫不远的地方，接着是第二发、第三发，俄国人又进攻了。

这时是凌晨4时。俄国方面布鲁西洛夫将军向奥匈军队的左翼发动猛攻。俄国人占据着有利地形，他们居高临下，先是实施炮火攻击，随后骑兵冲下山来。奥匈帝国军队跳出战壕，举枪迎战。大家厮杀在一起。

约瑟夫刚刚冲战壕，迎面冲过来一名吉尔吉斯骑手。说时迟，那时快，两米长的长矛闪电般向约瑟夫袭来。长矛的铁尖刺入了约瑟夫的左肋。约瑟夫先是感到一阵晕眩，随后就完全失去了知觉。

约瑟夫·布罗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他努力整理自己的思维，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创伤很深，

他还得了肺炎。

有一天，一个护士走到约瑟夫的床前，将一根红带子拴在了他的床头。这是一种记号，它说明，这床上的病人很快就要死了，在咽气之前应该从病房里将他搬出去。但是，约瑟夫·布罗兹又熬了过来。

现在他已明白。他做了俘虏后就作为重伤员被送到这里。这里是靠近喀山的一个小镇，名叫斯维亚西斯克。伏尔加河就流经这里。医院是由一座修道院改造而成的，简陋不堪。但是医生、护士们对伤员挺好。现在真当了俄国人的俘虏。他还曾为说当俄国人的俘虏而坐过牢呢！

约瑟夫眼下说不清事情会如何发展，说不清自己今后的生活将是什么样。他第一要做而且能够做的，是学习。最简便的是学习语言。俄语与约瑟夫讲的克罗地亚语十分相近。他学起来并不感到有什么困难。与战俘伤员的住室相对的房子，住着几位俄国的中学生。她们很愿意帮助约瑟夫他们。她们不断地送书给他们看。其中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

约瑟夫的伤口愈合很快，不多天，医生们断定可以出院了。出院后，他被送到另一个小镇阿旦托夫去干活儿。约瑟夫被俘前是一名上士，按规定他是可以不干活的。但约瑟夫觉得在这异国他乡，没有活计打发日子，是无法忍受的。所以，他要求给他活干。

这样，他又被分到离阿旦托夫不远的卡拉西也夫村。这里住有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也有俄罗斯人。约瑟夫的工作是管理一台磨面机。这台磨面机属于三家有钱的摩尔达维亚人共同所有。磨面机给村里和周围村子的居民进行小麦加工。

磨坊的活不多，约瑟夫有十分充足的时间进行学习， he 可以从村子的教员那里借书来读。时间长了，大家就混熟了。有一次，3个磨坊主人之一的农夫请约瑟夫洗土耳其浴。浴室里满是蒸汽，约瑟夫学着主人的样子，用树枝抽打全身。主人还提议将女儿嫁给他。

约瑟夫却以“我不打算结婚”拒绝了。在卡拉西也夫村，约瑟夫结交了几个朋友，他们明确向约瑟夫表明，他们反对沙皇。不久，他被遣送到乌拉尔地区的战俘营。

战俘营的主要任务就是修铁路。或者修筑一条新路，或者修复旧路。大家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每天都有人死去，重现了一年前的战场上的情景。俘虏营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美国的、瑞典的红十字会向他们寄发食品和衣服。战俘营还可以直接接触红十字会的代表。

人们发现俄国人的工头在偷窃红十字会发来的包裹。这引起了战俘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的工资极低，

所得报酬无法购买所需的足够的食品和御寒的衣物。战俘们把红十字会的赠予，看成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了它，就会少死些人。因此，工头偷窃的，绝不仅仅是财物；他的行为实质上是葬送那些体弱多病的战俘的生命。约瑟夫出头了：他直接写信给瑞典红十字会的代表，告发工头的可耻行为。这件事很快在战俘中传开了。

瑞典红十字会对此进行干预，工头受到了处罚。孔库尔地区红十字会负责人、一个年老的伯爵夫人也因此丢了脸。

但约瑟失却遭到了可怕的报复。作为俘虏营领队，约瑟夫负责记录战俘的出勤。有一天，3位罗马尼亚人在出工前发现靴子实在没法穿了，就留下修理自己的靴子。约瑟夫同情他们，就给他们记上了出勤。那位工头受到了处罚但并没有被撤职。他正在暗自找茬儿，他抓着了机会。工头闯进房子，质问约瑟夫，为什么3名罗马尼亚人没有上工，作为领队的约瑟夫却给他们记了出勤。

约瑟夫向他解释，他们修好了靴子会立刻去上工，因此才给他们记上出勤。没多久，闯进三个大胡子的哥萨克人。他们把约瑟夫送进了监狱。一跨入那所黑房子，哥萨克人就对约瑟夫下毒了手。他们一、二、三数着数，重重地冲约瑟夫背上整整抽打了30皮鞭。

沙皇被推翻后，约瑟夫被释放了。他又重新回到了俘虏营。俘虏营里群情激昂。俘虏中的克罗地亚人也感到有了希望。他们相互问：南斯拉夫的弗兰茨·约瑟夫什么时候也被推翻呢？

有一天，约瑟夫·布罗兹和其他几个战俘被带到工程师家。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工人。这是一群布尔什维克。大家在屋子里读了列宁的文章：《四月提纲》。然而，情况骤变。临时政府对工人阶级下了毒手。临时政府也不想结束战争。

约瑟夫又一次被抓进了监狱。但不久，靠了工程师卡茨的营救，他又获释。随后，约瑟夫被派遣到离彼尔姆不远的一个小车站，工作仍然是维修铁道。又过了不久，卡茨工程师给约瑟夫捎信儿过来，说同他联系过的几名工人已经被捕。约瑟夫觉得很踏实，决定逃走。

他想到彼得堡去，工程师的儿子在彼得堡。老工程师把儿子的地址告诉了约瑟夫，并给约瑟夫准备了几件便衣。

约瑟夫穿上便衣上路了。他徒步走了两站，然后爬上了一辆开往彼得堡的货车。几天之后，约瑟夫到达彼得堡。他很快找到了老工程师卡茨的儿子。

工程师小卡茨在彼得堡有名的普梯罗夫斯克工厂工作。他和父亲一样，热情接待了约瑟夫。几天之后，

彼得堡爆发了反对临时政府的7月大示威，约瑟夫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临时政府血腥镇压了这次示威，随后，又进行了大逮捕。卡茨工程师被捕了。约瑟夫无处安身，为躲避警察和宪兵，他在彼得堡的桥下藏了好几天。

无奈，约瑟夫决定再次逃走。这一次他想逃到芬兰去。在边境上，他受到了盘查。他不知道怎样回答为好。他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分——奥地利战俘。约瑟夫被遣送回彼得堡，进了监狱。

他被送进彼得堡巴甫洛夫斯克城堡。牢房是砖砌的，涅瓦河的河水一直涨到窗下。牢房里肮脏潮湿，耗子肆虐，连人都不怕。三个星期之后，约瑟夫被提审。他这次冒险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警察听后说：“笨蛋！早说是战俘早就放了你……还以为你是可恶的布尔什维克呢。”这样，他被告知，要被放逐到孔库尔去。

约瑟夫被押解上火车，他一直寻找着逃跑的机会。火车开得很慢，慢得烦死人。日子一天天过去。车到叶卡特林堡后，约瑟夫决定逃跑。他跟看守说他要离开车厢去取水煮茶。他被允许后迅速走出车站。刚出站他碰见了出站赶回车厢的另一名看守。一上来，这位看守还热情地向约瑟夫打招呼：“喂，伙计！”但他立即发现情况不对头，于是大喊起来，他还朝约瑟

夫举起了枪。

约瑟夫飞快跑进人群，并返回月台，极其敏捷地跳上了一辆已经启动的列车。上车后，约瑟夫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他表面上镇静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穿着便服，不时地用他那流利的俄语与周围的人搭话。没有人想到他是一位奥地利战俘，是一名在逃犯。

但叶卡特林堡站已经把一名战俘逃走的消息通报了沿途各站，让各站宪兵注意察访。车到图门车站后，一名宪兵走进车厢。不知怎地，宪兵径直朝约瑟夫走来。走近之后，他问约瑟夫：

“你们这里有一位奥地利逃犯吗？”

“没有。”约瑟夫用俄语回答。

宪兵离开了，查票员接着查票。当查到约瑟夫时，他决定摊开双手不说什么。

这一招还挺灵。查票员向约瑟夫笑了笑，就去盘问下一个人了。

车子继续东行，约瑟夫身无分文。但是，他从周围旅客那里得到足量的食品。车子越过乌拉尔，进入西伯利亚。一天傍晚，车开到阿塔曼斯基·胡托站时，列车被一群武装的工人所包围。

十月革命爆发了。这群工人是从附近鄂木斯克过来捉拿逃走的资产阶级的。他们盘问每一个人，

向大家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问到约瑟夫时，他如实讲了自己的情况。

工人们约瑟夫说，一切都很好。他们让约瑟夫赶回俘虏营去。他们说俘虏营已经宣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他们已经组成了红色国际纵队。

约瑟夫听了十分兴奋。他听从了工人们的意见，很快赶回了俘虏营。约瑟夫申请参加了红色纵队。这里面有捷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全是战俘。红色纵队多次要求上前线去，与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斗争。但红色纵队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对约瑟夫来说，在红色纵队中的最大收获是学习了列宁的理论。他们读了多篇列宁的有关俄国革命的小册子。当时，约瑟夫与军团的其他人一样，提出了加入俄国国籍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申请。突然，形势再度激变。捷克兵团发生兵变，他们支持白军，向红色纵队发起进攻，并很快将红色纵队打垮。随后，高尔察克海军上将挥军进驻鄂木斯克，宣布成立政府。鄂木斯克立刻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约瑟夫再次决定逃走。他这次不想再远行，决定在附近的乡村里隐藏起来。他逃到离鄂木斯克几十英里的吉尔吉斯人居住的村子。

约瑟夫也不老是躲在村子里。他还去鄂木斯克，与党的组织进行联系。鄂木斯克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

小组，领导人是迪米特里·格奥尔吉耶维奇。他当时是接受俄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小组的委派到这里来的，任务是在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南斯拉夫人当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在他们中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其间，约瑟夫被吸收为党员。靠了党的组织，约瑟夫了解西伯利亚政治军事形势，接受任务，在农民中间开展工作。他还可以从党的组织那里了解到自己的国家的一些情况。

约瑟夫在鄂木斯克没呆多久，他要回自己的祖国去。他决定取道彼得堡回国。临行前他与佩拉佳亚·贝卢斯诺娃结了婚。当时她16岁。

第二章 早期革命活动

约瑟夫一回国，立即被逮捕。

原来，约瑟夫在乘火车回国的途中，遇到了两个克罗地亚人。这两个人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他们冒充是从俄国归来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跟约瑟夫说了许多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事，并不断地大骂资产阶级。但是，当列车进入南斯拉夫境内之后，这两个家伙改变了腔调。他们一起向约瑟夫发起攻击，并恶毒地咒骂约瑟夫。最后，他们向当局告发，说约瑟夫是一名布尔什维克。

就这样，约瑟夫与他怀孕的妻子一起，被抓进了监狱。

几天后，约瑟夫获释，共产党当时尚未被宣布为非法，何况外国的共产党呢？

约瑟夫携妻子终于到达了自己的故乡扎果烈。

约瑟夫离开这里已经6年多的光景了。这6年之中，他的故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库姆罗维茨的家中，只剩下了他的一个弟弟。他的父亲已经迁到附近的另一个村子去住。而约瑟夫的母亲，已于两年前离开了人间。

1920年冬，南斯拉夫进行制宪议会全国大选。共产党参加了竞选活动。此间，约瑟夫与党的组织接上了关系，并且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了萨格勒布议会的竞选。这期间，共产党的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党领导下或在党的影响下的工会会员已达25万人。党员人数达6万人，成为共产国际中的第三或第四大党。在工人接连不断的斗争下，8小时工作制被接受，工厂主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地对待工人了。党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一个时期，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不容忽视。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的一支军队的全体成员宣布服从党的领导，统治阶级对军队的调遣发生了困难。在1919年6月匈牙利公社革命时期，亚历山大国王无法派军队去参加镇压公社的行列。这使南斯拉夫成为唯一没有派遣军队的邻国。农村的斗争也如火如荼。像约瑟夫的故乡扎果烈，农民在城里的工人和士兵的支援下，攻打了瓦罗日丁监狱，释放了前一段由于焚烧大地主庄园并分了他们的土地而被关押的300名农民。有人记载说，当时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城堡大火冲天，然后，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便分到了地主的土地。

这种形势对共产党的竞选活动十分有利。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在萨格勒布获得了59席，成为议会中第三大党。在其他城市，如贝尔格莱德，共产党的胜

利也是引人瞩目的。

当年“五一”节前夕，全国铁路工人和海员工人组织了大罢工。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对付了罢工工人。在卢布尔雅那，政府命令警察向示威的工人开枪，当场有10名工人被打死，20多人受伤。这时，党的总书记西玛·马尔科维奇教授实行单纯的退却战略，提出“让我们不要激动”的口号，致使罢工以失败而告终。

罢工失败后，中央委员会采取“继续退却”的战略，下达指示，要工人“留在家里”，不要出门庆祝自己的节日。

统治阶级得寸进尺，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威逼。在萨格勒布，共产党人德利奇当选为市长。就在市议会开会听取市长的讲话时，警察冲进会场，不由分说，便把市长带走了。如此“带走”共产党议员的事件也出现在贝尔格莱德。

约瑟夫所在的工厂，工资原本就很低，每小时3个克朗，而一间小屋的租金是每月600克朗，也就是说，一个月的工资付了房租就所剩无几了。问题是，就是这点可怜的工资约瑟夫也拿不到了，他被工厂开除了。

1923年全国组织大选。报纸上登出了一条消息，说一批工人想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而他

们到法院去进行候选人登记时，警察局逮捕了他们。约瑟夫和萨比奇看到这条消息后，立即去刊登消息的报纸编辑部，打听这些工人的详情。约瑟夫他们一等被捕者获释，就立刻找到了他们。当初，那些人不暴露自己的身分，只是给了约瑟夫一袋传单，要他们去散发。后来获得了信任，那些人才把实情告诉给了约瑟夫他们。这样，约瑟夫与党建立了联系，负责当地农民工作。不久，约瑟夫被选为党的区委委员。这样，他接触的人员多了起来。

区委里有一名委员叫约西普·瓦伦塔，是个木匠。他在整个别洛伐尔区很有威望。他的工作单位是一农具厂。他已经成功地组织了4次罢工。但瓦伦塔患有肺病，他于1924年不幸病故。党的区委认为瓦伦塔是一名出色的无产阶级战士，决定隆重地为他举行葬礼。先前，他曾参加社会民主党，因此，社会民主党认为瓦伦塔也是他们的党员，也要参加他的葬礼。

在瓦伦塔的棺材上，放着由镰刀斧头图案组成的花圈。送葬的队伍很长。

在下葬时，党的区委代表发表演说，代表是约瑟夫。

“瓦伦塔同志，我们宣誓，为了实现你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们将毕生战斗，战斗到底。”约瑟夫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演说。

随后，一面红旗在瓦伦塔的墓上兴起。参加葬礼的神父向警察局报告了此事。他认为共产党人组织的葬礼，打乱了他的宗教仪式。

警察进行了调查。他们找到了一个参加葬礼的锁匠。锁匠叫塞科维茨，是约瑟夫的好友。警察问他是谁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锁匠拒绝回答问题。但警察知道讲演者是一名磨坊工人。于是，他们就到面粉厂找到了约瑟夫。

约瑟夫承认自己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遭到了逮捕。警察把约瑟夫和塞科维茨锁在同一条链子上，带他们到别洛伐尔去。

塞科维茨身体很弱，他被拖带着，不时地摔跟头。他每次跌倒，铁链子就把约瑟夫拉一下。这样，弄得约瑟夫的手上鲜血淋淋。

约瑟夫他们在狱中呆了8天。幸好，调查官是一名希腊正教徒，他与告发约瑟夫的那名神父是敌对的。他在调查中，教给约瑟夫如何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审讯中，约瑟夫按照调查官说的回答问题，果然被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正赶上共和农民党因它的领导人出访莫斯科而被查禁。共和农民党转入地下。整个克罗地亚形势变得极为紧张。克罗地亚党的组织决定加强农村工作，令各级党组织收集武器，准备武装起义。约瑟夫他们接到了指示，他和萨比奇组织人力开

始了收集武器的工作，他们把收集到的武器隐藏在山里的一个秘密地点。这些武器一直保存完好，到1941年反法西斯入侵时，当地游击队很容易地拿到了这些武器。

约瑟夫常常被委派到萨格勒布与省委进行联系。有一次，约瑟夫在省委遇到了省委书记柳博·拉多瓦诺维奇。他向拉多瓦诺维奇全面汇报了别洛伐尔地区的情况，他谈到了农民的情绪，共和农民党的活动情况，区党委与共和农民党地方组织联系的情况，以及收集武器的情况等。约瑟夫就适应当前形势、开展党的工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令约瑟夫感到惊异的是，省委书记当场拒绝了他的所有建议。约瑟夫得出结论：有这样的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永远也不会取得自己的政权。回来之后，约瑟夫把见省委书记的情况以及自己的见解，全部告诉了萨比奇。

1925年开始，克罗地亚的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共和农民党的领袖们遭到逮捕。党的领导人拉迪奇躲藏了一阵子，遂向当局自首，然后被投入监狱。而拉迪奇很快便做出了出卖农民斗争事业的决定。他发表声明，表示承认王国和国王亚历山大1921年的宪法。这样，共和农民党的所有领导人都获释出狱。共和农民党还参加了尼克拉·帕希奇的政府。

农民们深感沮丧，农村革命形势遂进入低潮。共产党当时还无力扭转这种形势。磨房的情况也出现了变化。磨房的主人、年迈的山姆尔·波拉克对约瑟夫从事的政治活动一直不加干涉。他公开对约瑟夫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机器工人。我不管你在外面干什么。”但山姆尔·波拉克生病亡故了，磨房的产业由女婿奥斯卡·罗森堡继承。此人不但性格傲慢，而且贪图享受，他的开支不断增长，又无力多挣。于是，他就在工人身上打主意：减少工人的工资。这样，他就与工人们发生了冲突，而约瑟夫首当其冲。他把约瑟夫看作眼中钉。他对约瑟夫讲：要么你搞政治，要么你好生做工——二者你要选其一。他还串通警察，找约瑟夫的麻烦。他们差不多每个星期六都到约瑟夫的住处进行检查。

省委关心约瑟夫的处境，一些同志劝约瑟夫离开这里。最后，约瑟夫听从了省委会同志的劝告，离开了维立科·特洛茨伏村。离开的那一天，约瑟夫的所有朋友和熟人都来向他告别。大家站在村头，远远地望着约瑟夫离去。约瑟夫的心情也极不平静，他在这里生活战斗了4年零6个月，他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他的两个孩子也埋葬在这里。

约瑟夫在克拉列维察造船厂制造和修理蒸汽机和马达零件的车间找到了工作。

上工之后，约瑟夫便着手进行组织工会分会的工作。几个星期后，他被选为车间工会的领导人。此后，他恢复了由于警察恐怖而解散了的党的组织，并成立了工人体育协会。约瑟夫从特洛茨伏带来不少的书，他的家成了工人图书馆，通过这些图书，他影响并团结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

约瑟夫认为，最可影响和团结工人的莫过于组织工人为自己的实际利益而共同奋斗。在造船厂，厂方拖欠工人的工资已达半年之久。约瑟夫向党支部提出组织罢工、迫使厂方还清工人的工资的问题，党支部接受了约瑟夫的建议。他们向工人作了宣传解释工作，决定罢工两小时。

约瑟夫向工人们发表了演说。

约瑟夫入厂不久，就被选为车间工会主席。他对周围的工人熟悉很快，对情况的掌握也很及时。后来，人们在萨格勒布工会办的报纸上发现了约瑟夫写的一篇文章。当时的日期是1927年3月17日。铁托回忆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在报纸上写东西。文章发表10天之后，约瑟夫被工厂解雇。

约瑟夫被解雇后回到了萨格勒布。他先在一家机械厂找到了工作，但很快就离开了这家工厂。当年，党的组织决定让约瑟夫担任萨格勒布五金工人工会书记的职务。随后，他又被指定为全克罗地亚五金工人

工会的书记。从此之后，约瑟夫成为专业的工人运动行政人员。这对约瑟夫日后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

1927年6月天气炎热，约瑟夫又一次尝到了铁链子的滋味。这一次他与其他6个工人被串锁在一条铁链子上，在铁链子的末端被锁的，是一名跛脚的工人。也许是警察成心这样干的。这位跛脚工人赶不上快步前行的警察的步子，老是摔倒，而他每次摔倒，总是把其他6个人都牵倒在地。他们就是这样，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摔倒，直到上了火车。下了车，他们被送进了奥古林法院监狱。不久获释，返回了萨格勒布，在这里他再次被捕。并在10月14日宣布判决。约瑟夫·布罗兹被判处5年苦役，弗拉尼奥·诺沃塞利奇被判处3年苦役，安得里亚·博日契科维奇被判处2年苦役，其余无罪释放。

约瑟夫于1929年1月开始服刑。一开始，他被关在格萨勒布的一座监狱里。他曾试图越狱，但失败了。此后不久，约瑟夫被送进列波格拉瓦监狱。

列波格拉瓦监狱坐落在列波格拉瓦镇。小镇在伊凡奇卡山麓，离约瑟夫的家乡不远。此镇在古代闻名于全克罗地亚，因为它是当时克罗地亚科学文化中心之一。在17世纪，这里便出现了克罗地亚的第一所大学，这所大学由帕夫林教派所建。后来，当局把它改建成监牢。这所监狱的条件极差，狱方的残酷无情，

也闻名遐迩。

监狱里有一个发电厂，这里发的电不但供监狱用，还可供村子里居民用。约瑟夫被选为该电厂的机师。

这工作给了约瑟夫很大的活动自由，他还被获准看书。这样又过了几个月，约瑟夫身边出现了对他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的变故。莫萨·皮雅杰从贝尔格莱德的米特罗维察监狱来到了这里。皮雅杰由于出版《共产党人》而被判刑20年。当局不想让这位危险人物在某一个监狱里呆得太久。这样，他从贝尔格莱德那边被押解到了这里。

约瑟夫久仰皮雅杰的大名，他知道皮雅杰是个西班牙犹太人，知识渊博，对党忠诚。他早就希望见到他。

皮雅杰对约瑟夫的种种表现，尤其是对约瑟夫1928年在敌人公堂上的表现早有耳闻，也希望见一见这个工人出身的同志。

俩人一见如故。经约瑟夫向狱中请求，莫萨·皮雅杰成为约瑟夫的帮手。这样皮雅杰也获得了较多的活动自由。约瑟夫与皮雅杰一起要干的，是在监狱里建立党的组织，并与外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两条：一是领导狱中的斗争，二是组织大家学习，培养干部。学习的条件不好，没有教材，没有教师，但大家学习的劲头十足。党的组

织很快与社会上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这个任务也是由约瑟夫完成的。一是约瑟夫可以外出购物，二是约瑟夫要到监狱外面的居民当中去修理电器。当然，他外出时是有卫兵跟着的。

监狱的对门有一家咖啡店，咖啡店的楼上是住房。咖啡店老板是个克罗地亚妇女，她为人厚道，心肠好。她以帮犯人干事为荣。当她了解了约瑟夫的工作之后，便每隔两三个月让她房间的电灯“坏”一次，通知电厂派约瑟夫前来修理。当卫兵跟着约瑟夫到达时，老板便请卫兵在楼下喝一杯，由约瑟夫到楼上去“修电灯”。约瑟夫便借此机会与等在楼上的人谈问题。他可以向党的同情者进行宣传，可以向由萨格勒布来的党的负责人报告监狱情况，听取指示，也可以借此机会得到监狱中所需要的书籍及其他物品。

皮雅杰不但是位理论家，是文章高手，而且是一位画家。他作为电工的帮手，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外出，从事他的绘画事业。他给约瑟夫画了一张像，这张像从这个监狱传到了另一个监狱。后来成为铁托战友的吉拉斯就是通过这幅画像认识了铁托的。

1931年夏天，当局将70名犯人从米特罗维察监狱转移到列波格拉瓦监狱。他们之中有35名政治犯，即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他们曾抗议监狱不人道的伙食条件：吃叫人立即生病的发臭的蔬菜和发霉的

面包。宪兵与当局从闹事的人中挑出最危险的分子，把他们押解到了列波格拉瓦监狱。

35名政治犯的到来，使约瑟夫明白了，必须与狱方进行斗争，尽可能地把政治犯集中在一起，免受单人牢房之苦。

他们建立了狱中党组织——地方委员会。委员会有3人组成，约瑟夫是成员之一。

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狱方交涉，让政治犯几个人住在一起。这项工作经过绝食斗争，取得了进展。

委员会的另一任务是组织犯人进行学习。约瑟夫自己则极充分地利用了这次学习的机会。他学了语言，先学了世界语，接着又学了英语。而更多的时间，是与皮雅杰一起切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时，皮雅杰正在翻译《资本论》。

委员会还有一项任务是与外界进行联系。这种联系不但出于组织的需要，而且是出于思想建设方面的需要。政治犯身陷囹圄，心系国家。他们经常发问：外边，政治局势如何？外边，党是否还在活动？当知道外边党不但存在，党在活动，而且党一直关注狱中的同志时，大家就会觉得长期服刑、备受折磨还值得，今后的日子再长，也可以熬得过……

与外界联系的任务，大都落在约瑟夫的身上。在

1931年4月的绝食斗争中，约瑟夫起到特殊的作用。这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局遂做出决定，要使危险的约瑟夫离开列波格拉瓦监狱。

1931年6月，约瑟夫被解往马里博尔监狱。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诸位战友，尤其是莫萨·皮雅杰。

约瑟夫来到马里博尔监狱时，狱中有4名政治犯。他们还被关在单人房间里。为了实现几个人合住的要求，4个人曾进行了长达10天的绝食，但狱方没有让步。

约瑟夫同样被关在单人房间里。但他终于想法与原来的4个同志联系上了。约瑟夫与大家商定，大家团结一致，持续不断地提出抗议，迫使狱方接受条件。通过斗争，没过一个月，狱方答应了5人合住的要求。他们合住后，立即组织了起来。

这里政治犯不多，与外界的联系也很困难。组织起来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我教育和学习。

这里生活条件很糟：伙食差得难以下咽，房子里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灯，臭虫多得吓人，而且没有法子捕捉、消灭。

在此与约瑟夫一起服役的乔拉科维奇回忆说，那时的约瑟夫，形容消瘦，面无血色，一身囚衣，看上去活像个苦行僧。乔拉科维奇说，约瑟夫很少笑出声来，但不笑则已，一笑纵情。

乔拉科维奇说，那时他们也有欢乐的时刻：围坐在一个想方设法才弄到的旧铁火炉四周，大家合抽一支香烟，自称是“资产阶级”；有时，布罗兹大谈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是犯人得意的话题。有些夜晚他们组织晚会，先唱国际歌，接着唱其他革命歌曲，最后则哼起小调，开始还算柔和，最后是扯开嗓子大喊，直到警察前来干涉为止。

1933年11月的一天，约瑟夫得到了服刑期满的通知。

约瑟夫服刑期间，南斯拉夫政治进入了最黑暗时期。这时，不满的已不只是共产党人。1932年12月7日，农民民主联盟包括马切克在内的9名领导成员在萨格勒布开会，对时局进行了分析，并起草了《五点声明》，谴责1929年1月6日的独裁统治。

约瑟夫离开马里博尔监狱之后，实际并没有被立即释放。他又被送往奥古林。当局通知他，他还需在此服刑3个月。3个月后，他被释放。但警察告诉他，他必须回到老家库姆罗维茨去，而且永远不许离开那里，每天还须向乡主席报到。

约瑟夫于1934年3月底回到了家乡。回乡之前，他做了一身新装。他径直回到了家里，约瑟夫得知，他的兄弟德拉古丁·卡罗不久前刚刚死去。

当天，他向乡主席报了到。乡主席叫约瑟夫·朱

拉克，与他从小就认识。约瑟夫一进乡主席的办公室，门就给关上了。乡主席首先对约瑟夫·布罗兹在法庭和狱中的杰出表现表示祝贺。这使布罗兹大吃一惊。随后，乡主席告诉布罗兹，他用不着天天前来报到。

约瑟夫在库罗姆维茨呆了几天之后，就去了斯洛文尼亚他外祖父家。他曾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4月底，约瑟夫离开家乡。约瑟夫从家乡消失后警方立即发出逮捕令。

他去了萨克勒布。他化了装，把胡子刮了个精光，头发改变了颜色。一副金边眼镜，一身讲究的衣服，叫人看上去已不是原来的约瑟夫了。起初，他用“罗迪”这个名字，但因有同名者，遂又改为铁托。铁托这个名字在约瑟夫的故乡多被采用。铁托·勃莱卓伐茨基就是100年前果扎烈出来的著名作家，克罗地亚的伟大作家山道尔·热拉斯基的父亲也叫铁托。

到达萨格勒布后，铁托很快便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重要的是他在法庭及狱中的表现得到承认：他被选为省委委员。

铁托进入省委之后，省委决定派他到维也纳去一趟，与中央建立正常联系的渠道。

铁托很快与中央接上了头，他见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当时，中央书记是米兰·高尔基奇。他不到30岁，高大的身材，体格强健。见铁托到来，高

尔基奇和其他中委很快将他围起来，犹如蜜蜂见到了蜂蜜。显然，他们迫切想知道南斯拉夫国内局势及党组织的状况。铁托详尽地向他们说明了一切。普通党员对党中央设在国外的意见，对中央委员会派回的人不断遭到逮捕、使国内组织受到破坏的意见，铁托也直截了当地讲了出来。

汇报之后，铁托接受了返回南斯拉夫组织召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党代表大会并筹备南斯拉夫党代表会议的任务。在维也纳，他给萨格勒布省委会写了到中央来的工作汇报，并将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消息告诉了省委。

铁托返回萨格勒布后，即着手组织克罗地亚及斯洛文尼亚党代会。克罗地亚的党代会按照中央要求的时限召开。过后，铁托向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说代表们对代表大会印象特别深刻。但会议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以致资料准备不齐，代表们“毫无准备”而不能很好地发表意见。他说克罗地亚省委会将在实际工作中弥补这些缺陷。

铁托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斯洛文尼亚党代会的组织工作上。会前铁托首先改组了省委会。

代表会议于1934年9月15日至17日，在斯洛文尼亚主教罗兹曼建在卢布尔雅那以北8英里梅德伏德的避暑别墅里举行。

参加会议的共30名代表。代表们在别墅里吃住，主教的兄弟把丰盛的饭菜摆在饭厅里，桌子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杯子晶莹透亮，上等的瓷碟上印有主教的纹章。他是因为与哥哥不和，被哥哥从城里赶到这里来的。

代表会议的宗旨是使斯洛文尼亚党的组织进一步活跃起来。因此，会议决定，党必须在各方面开展活动，以便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团结，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和民族权力。

会上，铁托第一次与卡德尔及基德里奇见面。这两个人若干年之后成为以铁托为核心的南共政治局成员。

斯洛文尼亚党代表会议的成功举行，是铁托受中央委托完成的第一项重要实绩。会议结束不久，他又被召回维也纳。

到达维也纳之后，铁托得到了去莫斯科的通知，不过手续迟迟未办。这期间，铁托继续参与南斯拉夫党代会的筹备工作。

全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会议于1934年12月24 - 25日在卢布尔雅那召开。地点是铁托曾躲避警察的一个公寓。共有11名代表，代表未经选举，而是由中央指定的。当时的条件尚不允许推选代表，政治形势极端恶劣，代表们随时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

险。

会议着重讨论了开展青年工作的重要意义，并研究了开展工作的措施。此外，还听取了关于党的内外政策的报告。会议详尽地讨论了资产阶级各国发动反苏战争可能性的问题，并对党的行动策略提出了见解。

会议选出了以高尔基奇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铁托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高尔基奇与铁托没有赶上大会的开幕。他们是第二天赶到会场的。散会之后，会议代表分散着离开会场，踏着街道上的积雪，各自返回出发地。铁托返回维也纳，于1935年2月赴莫斯科。

本来，共产国际决定把铁托安排在工会红色国际。后来，征得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的意见，共产国际改变了决定，遂将铁托安排在巴尔干书记处。这一变更对铁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果他被分配管工会工作，或许他一生就只能做一名工会干部了。

对铁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南共总书记的一封“介绍信”。这封信是高尔基奇写给乔皮奇的，信中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同意铁托做书记处的工作。

铁托很快发现，这里不比国内。在国内，党差不多处于无政府状态，他可以放开胆子，大干一场。这里就不一样了。在莫斯科，像他一样的人物，充其量

只能作为权力金字塔的底座——如果不算上塔基的话——他的上边全是“婆婆”，因此，他必须慎言慎行。

铁托还利用一切机会结识各国党的领导人。这些人有：保加利亚著名共产党人格尔基·季米特洛夫，事实证明，他对铁托的政治前途起着关键的作用；德国共产党人威廉·皮克，他是铁托工作中的顶头上司；德国共产党人沃尔特·乌布利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法国共产党人莫里斯·多列士；意大利共产党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美国共产党人埃尔·白劳德。铁托与白劳德是在公共浴室洗澡时第一次见面的。铁托与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用了另一个名字。他那时叫瓦尔特。

瓦尔特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正赶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紧张的筹备工作。大会的召开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件大事。

大会的宗旨是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大会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来自全世界的65个代表团40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大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开幕。主席台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当唱罢国际歌，威廉·皮克致开幕词后，会场里顿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斯大林出现了。

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斯大林被领到自己的位子上，十分镇静地坐了下来。他的这种冷漠态度与代表们迸发出来的火一般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季米特洛夫与陶里亚蒂在会上做了报告。当报告人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会场总是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不过，斯大林没等会议结束就离开了会场。主席团没有向与会者说明他离开的原因。

这是铁托第一次见到斯大林。不用说，斯大林的形象给铁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的内容同样给铁托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会议确定了共产国际，也就是各国共产党策略的重大转变。

以往，各国共产党人总是被告诫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共产党不要跟其他左翼政治派别实现联合，以免混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界限，给工人群众带来消极影响。现在，共产党则要积极地团结和联合它们，以便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反对法西斯和各国反动政府。共产党夺取政权这一根本任务没有改变，但它成为下一步的，或者是未来的长远目标。敌人的阵线也做了重新划分。原来是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均为敌人。现在要承认某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还有美国，这对反对法西斯主义具有积极意义，

其理论根据是这类国家具有“非侵略性”。

大会最后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南斯拉夫共产党组成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大会。铁托是代表之一，而且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职务秘书长。这一身份使他得以出席大会的各种会议以及各委员会的会议。这样，他不但可以熟悉人，而且可以学习、了解会议的组织工作，他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最后提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候选人时，他是三名中的一个，而且在选举时，铁托的名字获得通过。但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这一职务理所当然的应由3名候选人之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高尔基奇来担任，因而出面干预，遂将铁托的名字划掉，而换上了高尔基奇。但高尔基奇没有当上正式执委，他只被认定为执委会的候补委员。

大会结束后，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会议再次选举铁托为政治局委员。

铁托的妻子贝卢斯娃在铁托1929年坐牢时，由党的组织把她送到莫斯科。铁托来莫斯科后了解到，贝卢斯娃已经改嫁，她的新丈夫是苏共党的干部。对带来的儿子贝卢斯娃没有抚养，苏联另一位好心的妇女收养了他。

1935年5月，南斯拉夫举行普选。共产党领导机关在如何对待普选的问题上再次发生严重分裂。

普选时，共产党仍然处于非法状态。当初，总书记高尔基奇发出指示，要共产党通过党控制的合法组织劳动人民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指示发出不久，高尔基奇又收回成命，要求共产党员与以农民党为核心的反对党候选人一起活动，并且投他们的票。表面上看，这符合共产国际的新方针，但却严重脱离南斯拉夫实际。一方面，农民党领袖马切克拒不接受与共产党的这种合作，而另一方面，农民党也未能在选举中获胜。在选举中获胜的，是亲纳粹的右派头子米兰·斯托亚季诺维奇。他出任首相后，因共产党暗地里参加反对派，遂变本加厉地对共产党进行了镇压。而党的组织又正好给新的镇压提供了口实。

锡萨克的党组织组织了一次工人集会。结果，集会失控，出现了亲苏示威，示威者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克罗地亚的要求。政府加紧了对党的活动的侦察。此后不久，党中央组织书记奥吉耶·米特洛维奇被捕。他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但要命的是，他被捕时身上带着党的积极分子名单。这名单没有来得及进行处理，便落入警察之手。于是，警方很容易地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共产党积极分子中的960余名捉拿归案。通过审讯，政府掌握了有关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的大量情报。这样，处于非法状态的共产党似乎一下子被摧垮了。

1936年4月，趁高尔基奇不在的情况下，乔皮奇召集在布拉格与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们开了一次会议。乔皮奇的这一活动，不但没有请示高尔基奇，也没有请示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发现乔皮奇的这一活动后，遂对南斯拉夫党的中央机构采取了断然措施：解散中央委员会，选举新中央。说是选举，实际是任命。总书记仍由高尔基奇担任，铁托则被选为组织书记。这组织书记就是党的第二把手。时势给了铁托一次关键性机会。

反对高尔基奇的乔皮奇等人被清除出了中央委员会。铁托还构不成高尔基奇的反对派，但在两个原则性问题上，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分歧。第一，铁托力主把党的领导中枢由国外迁到国内；第二，不要再从共产国际领取党的津贴。对这两点建议，高奇基奇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最后，他们在第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将中央分成两部分，作为党的政治书记，高尔基奇仍留在国外，作为党的组织书记，铁托回国工作。

铁托于1936年离开莫斯科，高尔基奇给铁托准备了一个护照，并给铁托安排了回国的路线。

铁托十分警觉。他了解到，凡是按高尔基奇指示的路线回国的，全部在南斯拉夫边境上遭到了逮捕。铁托提防着高尔基奇的暗算。于是，他自己准备了另一个护照，并且选择了另一条路线。

铁托在维也纳和巴黎呆了些日子，于1936年年底回到了南斯拉夫。铁托的急切的任务，是重新建立起党的组织系统。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甚至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警方的方针是打进共产党的组织，甚至打进最高层，从而不断地弄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以便对共产党聚而歼之。事实证明他们这一手很是成功。因此，共产党刚刚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马上就会来一次逮捕，党的领导和活跃分子被一网打尽。这一状况一再发生，除了最大胆或最莽撞的人之外，谁还敢继续在党内干下去？铁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问题的危险性，但任务是非完成不可的，关键是要有办法对付警察搞的阴谋。

回国后的几个月，铁托全力以赴地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铁托的合法身份是一名工程师。可以说这一角色他扮得是十全十美的。这位“工程师”富有“成就”，因此生活相当“富裕”。这种情况才能使他接连不断地外出，在各地跑来跑去，会见并结识各种各样的人。

1937年头几个月，他奔走于斯普利特、萨格勒布、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各地，恢复旧有的关系，物色新的人才。

铁托活动的中心是萨格勒布。这里的警察力量比贝尔格莱德弱得多，而这里的情况他十分熟悉。

但萨格勒布的党组织被彻底捣垮了。铁托必须重新建立党的指挥中心。不过，铁托并没有急着把新班子组建起来。他决定等一等，等把警察可以利用来找到省委新领导的线索全部中断之后再说。在此情况下，铁托利用每一个部门的合法的工作形式进行工作，委任这些部门的领导，使他们直接与他本人进行联系，而暂不建立组织系统。如工会是合法的，铁托便指定某几个人组成工会委员会，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这一形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才组建了党的省委。

1937年8月1日夜半时分，克罗地亚地区的19名代表在铁托的主持下，在萨莫博尔郊外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代表会议，选出了由12名委员组成的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所以称“中央委员会”，是在执行1934年共产国际的决定。那时共产国际决定克罗地亚要成立独立的党组织。而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铁托交给了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他的父亲作为法官，曾经审讯过铁托。其他地区的党组织的情况与克罗地亚不同，铁托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逐步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系统。

铁托后来在巴黎得知，党的总书记高尔基奇已经被召到莫斯科，而且在那里“失踪”。

人们对总书记究竟犯了什么罪，而受到如此严厉

的处置，众说纷纭，但不管怎么说，南共党又受到了挫折，对于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南共总书记出现了空缺。谁将担任此职，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

南共是以派别纷争闻名的。在共产国际，流传着对南共的这样一种评价：两个南斯拉夫人——三个派别。

总书记的空缺，使南共的派别活动又变得激烈起来。本来，铁托作为组织书记、党的第二把手，在总书记的职位出现空缺时，依次填补上这个空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铁托还必须经过艰苦的争斗。对于党内的这种形势，铁托心里明明白白。

到达巴黎之后，铁托立即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中央委员中，以及在中央委员会周围，都有铁托的反对派。

铁托明白，南斯拉夫革命的前途不在巴黎，而在国内。但当时他还不可能把中央委员会迁入国内。在此情况下，等中央委员会这边的情况稍一平稳，他便离开巴黎，回到了南斯拉夫。他必须建立自己的牢固的根基，要回来整顿党的组织，开展工作，树立自己的权威。

他感到庆幸的是，在国内开展工作，他已经物色到了一批人，他可以较从容地建立以自己为首的领导

核心了。

1938年3月12日，萨格勒布警察当局收到一份密报，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将回到萨格勒布。警方得到的报告说，铁托用的是一份假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工程师约瑟夫·托马尼克。警方得到这一情报之后欣喜若狂。他们说这一次可要网一个大鱼了。

在克罗地亚与意大利交界的边境上，在斯普利特港和杜布罗夫尼克港，在认为一切铁托可能出现的地段，南斯拉夫警方都加强了警戒。

可是，铁托早于3月底以前抵达贝尔格莱德。

他用的并不是工程师约瑟夫·托马尼克的护照。他是以一名富有的旅游者的身份入境的。警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怀疑。不过，他到达贝尔格莱德住进一家旅馆后，曾受到一名便衣警察的盯梢，原因可能是那个警察认为铁托那头红色的头发不太地道。铁托发觉自己被盯梢后，比较轻易地甩掉了那个蠢货。

铁托心里还明白：虽然南斯拉夫革命的前途不在巴黎，也不在莫斯科，而在南斯拉夫国内，但是，这个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莫斯科。党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处理好与莫斯科的关系。他所设想的一切，必须得到莫斯科那边的首肯。

6月，他果然收到了季米特洛夫要他去莫斯科的

命令，接到去莫斯科的命令后，铁托即刻动身赴巴黎，在那里等待去莫斯科的入境签证。

7月，他从巴黎给季米特洛夫发了封信。

在信中，铁托向季米特洛夫报告了马里奇和库索瓦茨的阴谋活动，并且报告说，他已经撤去了他们的党内职务。铁托说，但事情并没有完结。马里奇一直在夸口，说他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铁托在信中说，他怀疑共产国际中确实有人在支持马里奇他们，因为据说共产国际的某些官员曾背着他与马里奇等开过会。对此，铁托十分生气。

1938年8月，铁托终于等着了入境签证，登上了赴莫斯科的旅程。8月24日到达莫斯科。

这时，斯大林的镇反正在加紧进行，共产国际也受到了洗劫。卢克斯旅馆的房客中许多人被捕。

铁托来莫斯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帮助外文出版社完成《联共（布）党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翻译工作。他的两个对头——乔皮奇和约瓦诺维奇已经先期到达。铁托协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他仍然是慎言慎行，但这次情况与上次已经不同。这次任务十分明确，就是来为党，也为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生命战斗。他绝不打算认输。

铁托等待着季米特洛夫的接见。但他来了两个月的光景，却仍未能见到季米特洛夫。10月17日，

他再次写信给季米特洛夫，要求季米特洛夫接见，并要求“就我们的问题”作出决定。他在信中强调，“这次会见不仅对我个人，而且对于我们党的发展都将具有历史性意义”。3天后，季米特洛夫接见了铁托。

对季米特洛夫提出的问题，铁托做了肯定的答复，并且当面系统地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他前一段在南斯拉夫为恢复党的组织所作的努力，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明显成效。季米特洛夫告诉铁托，他一直相信铁托所陈述的这些事实。而正是这些事实，才避免了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解散的命运。最后，铁托又一次向季米特洛夫陈述党的领导设在国内的重要性。季米特洛夫同意铁托的见解。

季米特洛夫通知铁托，他已经被委任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临时总书记，因为这一职务尚须执委会会议最后批准。

铁托回国后，立即投入整顿和健全党组织的艰苦斗争。

1939年的夏季某一天，铁托收到了负责安排旅苏的共产国际巴黎办事处的一封信。信中说季米特洛夫有令，要铁托在7月底之前去苏一趟。信中说，季米特洛夫本人的指示写在一张纸片上。小纸片藏在一本书里，将由交通员把书带给在贝尔格莱德的洛拉

· 里巴尔，然后再由洛拉·里巴尔交给德迪耶尔，后者再交给铁托本人。铁托按事先约定，要到德迪耶尔家去取那本书。铁托赶到时，德迪耶尔的妻子正在书房里会客。铁托乔装成工程师巴比奇。他只好陪着德迪耶尔的妻子及她的朋友聊天。从文学到音乐，足足聊了一个小时，德迪耶尔妻子的客人才离开。客人一走，铁托便与德迪耶尔打开那本书，取出季米特洛夫的便条。

6月底，铁托乘船离开南斯拉夫，8月才到达苏联。铁托到达时，正值宣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原来，铁托被召到莫斯科，主要是来接受苏方的宣传口径，正确对待苏德条约的签订。

苏方的做法非常巧妙。苏共联络部的高级干部、驻共产国际代表马努伊尔斯基把包括铁托在内的各国党的代表召集在一起，给大家布置了一份“作业”：根据当前形势，各人为本党写一份宣言，规定党的活动方针。

铁托认为问题是十分明确的：希特勒想通过条约使苏联保持中立，以利于德国在欧洲的征战；而苏联则希望通过条约的签订保持较长时期的和平，这并不改变法西斯是主要危险的论断。

铁托按此思想很快写了一份宣言，并按规定的时时间去了会场。而耐人寻味的是，只有铁托写就了“宣

言”。其他党的代表都交了白卷。

铁托宣读了自己的“宣言”。马努伊尔斯基很高兴，连声叫好。并在最后对大家说，各党的“宣言”中不必提到苏联，只写法西斯对本国造成的危险。他明确说，苏联与德国签约，是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每个国家必须注意法西斯进攻的危险，一旦遭受到这种进攻，就要坚决地进行抵抗，直到胜利。

铁托在莫斯科还最终完成了《联共（布）党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译本的付排工作。这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

1940年1月，铁托终于被允许回国。但是在路上他遇到了麻烦。他乘船从敖德萨出发，到伊斯坦布尔后再乘火车进入南斯拉夫。

两天后，铁托到达萨格勒布。他下车后迅速消失在人流之中。这已是1940年3月底，他在旅途上花去了三个月的时光。几天以后，铁托在萨格勒布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萨伏亚伯爵’号轮船在直布罗陀为英国当局所扣留，因为船上有一名叫做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可疑人物。美国乘客对于这一行动提出了抗议，因为轮船可能因此而晚点。”

这时，希特勒的军队接二连三蹂躏了许多欧洲国家，而且对南斯拉夫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南斯拉夫卷入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此情况下，原来决定要召

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一定要刻不容缓地进行筹备。

首先，铁托向各地党的组织发出指示，让基层组织召开会议选举代表或指定代表参加地区会议，地区会议再选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共需选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101名。选举代表当然是十分重要的。铁托亲自出席了许多地区会议。代表大会的会议地点是铁托亲自选定的。它处于萨格勒布郊外，这是一幢很大的房子。工作人员把其中的两间打开，作为大会会场。它的一端设有主席台，主席台的墙上悬挂着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承担大会各项准备工作的是一个专门成立起来的工作小组。铁托亲自领导了这个小组。小组工作人员，还包括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书记拉德·康查尔，还有一名专门的司机。

10月18日，代表们全部到齐。大家一起挤在那幢房子里，等待大会的开幕。到达后，每位代表都填写了大会制定的表格。从登记表统计，101名代表中有工人33名，农民14名，知识分子29名，雇员5名。代表的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80名代表曾遭警察逮捕过，42名在狱中服过刑。

大会于10月19日上午8时30分开幕。

在狱中度过14个年头后又在比累恰的政治犯集中营关了几个月、新近获释的莫萨·皮雅杰致欢迎词，

宣布大会开幕。主席台上就座的，除莫萨·皮雅杰外，还有铁托、卡德尔、里巴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梅托迪耶·沙托罗夫。

铁托作了主题报告。他总结了“四大”之后党的工作，分析了党面临的形势，提出党的战斗任务。他还以相当大的篇幅谈了党的干部问题。

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由29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和由7人组成的新的政治局。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有：约瑟夫·布罗兹·铁托、爱德华·卡德尔、密洛凡·吉拉斯、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伊万·米卢蒂诺维奇、拉得·康查尔、弗兰茨·莱斯科舍克。

1940年10月，意大利进攻希腊。德国援助意大利，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强行要求南斯拉夫允许德国的战争物资过境。这实际上是在破坏南斯拉夫的中立政策。随后，德国进一步向南斯拉夫施压，干脆要南斯拉夫参加三国公约。

英国也同时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求它不要参加轴心国。但英国人的压力远远比不上德国的压力大，手段也远比德国差。德国人不但晓得英国的意图，而且了解英国人的具体做法。因为英国的行动是通过美国驻贝尔格莱德的特别密使威廉·唐诺文进行的，而唐诺文的密码已为德国人所破译。

1941年2月，德国占领罗马尼亚，3月又占

领保加利亚；对南斯拉夫的包围圈正在合拢。而德国人的外交攻势也在加强：2月14日，希特勒召见茨维特科奇本人，当面要求他参加轴心国。3月4日，又召保罗亲王见他，强命保罗回国向内阁施加压力。3月6日，保罗亲王向内阁施压。结果，8名内阁大臣投票同意签署加入轴心国的条约。3月23日，德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通知南斯拉夫政府说，希特勒要求条约在48小时之内签署。3月25日午后，首相茨维特科维奇和外交大臣青察尔—马尔科维奇在条约上签了字。3月26日，英国广播欧洲联播网向南斯拉夫播送了利奥波德·艾默礼的一篇演说：

如果（南斯拉夫）人民清楚表明他们认为参加轴心国条约便是出卖荣誉和独立，那么，政府肯定有责任在该条约批准之前同人民商量。不，要这样做还为时不晚。南斯拉夫的整个前途正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关头。

事实上，进攻南斯拉夫的时刻在日益逼近。

在战争危险日益逼近的形势下，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备战，唤起民众警惕并迎接战争的到来。

第三章 与希特勒战斗

4月5日，德军出其不意地占领了南斯拉夫境内被称为“铁门”的多瑙河的咽喉杰尔达普。6日，德军出动450架飞机对贝尔格莱德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意大利飞机则轰炸了达尔马提亚的若干城镇。集结于保加利亚的德军第十二集团军，按原订计划迅速插入南希边界，切断了南希的联系。7日，轴心国军队占领斯科普里。10日，萨格勒布失守。12日，贝尔格莱德沦陷。

4月15日，南斯拉夫政府与佩塔尔国王逃往希腊。临走前，西莫维奇首相任命达尼洛·卡拉法托维奇为最高指挥部参谋长，并授权参谋长与德国人谈判，实现“体面的停战”。参谋长又指定了谈判“全权代表”。但德军要的是南斯拉夫的无条件投降。参谋长指派的三位代表拒绝德方的条件，返回出发的地点最高指挥部所在地萨拉热窝，这是16日。而等他们返回时，萨拉热窝已被敌人攻占，最高指挥部一时不知去向。

实际上，14日，南斯拉夫最高指挥部已经决定交出军队、阵地和交通要道，这个命令也已下达。命

令还规定在敌军挺进中，南军不许抵抗，这样，南军 3 3 7 8 6 4 名士兵和 6 2 9 8 名军官成了德军的俘虏。

这之后，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被划归邻国，其余地区则处于军事占领之下。戈雷尼斯和什塔耶尔被德国吞并，剩余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则划归了意大利。匈牙利得到了普雷科穆尔耶、梅久穆尔耶、巴奇卡和巴拉尼亚。保加利亚则得到它早就垂涎三尺的马其顿奥赫里德以北的地段以及科索沃的一部分和塞尔维亚的东部地区。

黑山被意大利接管；塞尔维亚剩余地区受德国军事长官直接管辖；克罗地亚被宣布成立独立国，边界亦有更改。

铁托的一位邻居从德国的广播里知道贝格莱德受到了侵犯。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铁托。

铁托立即召集在萨格勒布的同事研究局势。在希特勒军队进入萨格勒布的当天，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南斯拉夫人民发出了号召：\$

你们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并为它而死去，但必须相信这一斗争一定会以胜利而结束……不要沮丧，团结起来，不要在你们所遭受的沉重的打击面前低下头来。\$

月底经过艰难的准备，在萨格勒布召开了南斯拉

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铁托主持下进行。会议的主旨是反对侵略，举行起义。会议一致认为，反侵略的起义一定要具有广泛的性质，这一方面要求起义的范围和规模一定是全国性的，另一方面要求起义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要建立反对侵略的统一战线。

对于后一方面的问题铁托在会上做了一个说明。铁托指出，南斯拉夫人民激烈地反对国王和前政府，因为他们出卖了祖国。他们实际上成为与法西斯沆瀣一气的“第五纵队”。因此，反对侵略者的起义应当与反对“第五纵队”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塞尔维亚人民必须发动坚决的斗争，反对塞尔维亚人民的卖国贼”。

会议决定在全国继续努力，建立武装的突击队。党的领导中心要从萨格勒布迁到贝尔格莱德。

从南斯拉夫各地不断传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许多地区的突击队已经组织起来并开始了活动。

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当天，铁托召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认为起义的时刻已经最终到来了。铁托亲自起草了一篇宣言。宣言说：

6月22日清晨，疯狂的德国法西斯匪徒，进攻了伟大的友好和平的工农国家苏联……

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到来了。反对工人阶级的最大敌人的决定性战斗已经开始，这是法西斯分子通过

他们向苏联——世界无产者的希望——的背信弃义的进攻而引起的战斗。英雄的苏维埃各族人民正在流着宝贵的鲜血，这不仅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国土，而且也是为了整个劳动人类最后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因而这是我们的斗争，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甚至贡献出我们的生命。

南斯拉夫各地的无产者，到你们的岗位上去——到斗争的第一线去：团结在你们的先锋队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周围！各就各位！毫无畏惧、毫不犹豫地去完成你们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准备进行最后的生死存亡的斗争！苏俄英雄人民正在流着宝贵的鲜血，不要袖手旁观！你们的口号必须是：不让一个劳动的男人和女人到法西斯德国去干活，去增加法西斯匪徒的力量！不让一门炮，一枝步枪，一粒子弹，一穗谷物通过你们的帮助而落到法西斯分子的手中！动员你们的一切力量，防止我国沦为法西斯畜牲的供应基地，这些畜牲疯狂地进攻苏联——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希望，全世界劳动群众怀着渴望的心情瞩目的灯塔。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们！一刻也不要动摇，赶快准备投入严酷的斗争。为了这个决定性的斗争，迅速安排好你们的组织及工作。尽一切可能保护我们的干部，因为这次斗争比以往更需要干部。

组织劳动群众，并让他们利用你们千辛万苦取得的经验，站在劳动群众和受民族压迫的群众的前列，领导他们参加反对我们各族人民的法西斯压迫者的斗争。要勇敢、遵守纪律，要沉着，因为你们必须给别人做出榜样。履行你们作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职责。为了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向最后的决战前进！

6月27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会，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成立反对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在全国各地建立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

在贝尔格莱德，德国的宣传搞得热火朝天。表示德国坦克横冲直闯的巨幅地图贴在巨大的布告牌上。所有的无轨电车、所有的墙上，都贴上了德国的招贴画。挂在电杆上的扩音器高声地广播着来自苏联前线的公报，报纸出了特刊。

贝尔格莱德党团决定对嚣张的反动宣传采取破坏行动。他们选中了报纸。他们3人一组，同时走近全市100余个报摊。3个当中，一个抓起报纸，一个浇上汽油，第三个人划着火柴，将浸透汽油的报纸点燃，然后迅速离去，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一活动的效果极佳。全市100多家报摊的报纸被焚，而参加活动的只有一个小队落入德国人之手。

破坏活动以惊人的浪潮向前推进。德国人使用的

电线被割断了；德国兵在黑暗的街道上遭到袭击；他们的武器被夺走；德国人停放着的汽车被烧毁；武器库被炸……

德国人在贝尔格莱德发布了宵禁。游击队则对执行德国人命令的伪警察进行打击，最先丧命的是那些为虎作伥、作恶多端的家伙。游击队的广大活动天地还是在农村，这一点给铁托极大的启示，他派遣了 12 名中央委员到全国各地去建立和指导游击队。

7 月 1 日，又接到季米特洛夫的急电：

共产党人必须对侵略者发动一场公开的斗争。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一刻也不要延误，要在敌后建立游击队，展开游击战……希望接到上述指示后复电告知执行情况。\$

铁托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7 月 22 日，铁托印发了特别宣言：\$

“南斯拉夫人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其他各族人民，要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结起来，进行战斗，抗击屠杀我们人民的侵略者及其仆从，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不要在敌人的恐怖面前动摇。要猛烈地攻击法西斯匪徒们占领的要塞，来回答敌人的残暴。”\$

这期间，在南斯拉夫各地，已经出现了多起武装抗击入侵者的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是有领导进行的，

有的是自发的。

7月底的一天，兰科维奇在组织爆破贝尔格莱德电台的过程中被敌人逮捕。铁托感到十分吃惊。他立即指示贝尔格莱德的党组织营救兰科维奇。兰科维奇入院的第二天，贝尔格莱德的党组织就接到了发自医院的报告。兰科维奇有了下落，一项周密的营救计划随即拟定。

在医院作大夫的一名共产党员把医院的走廊和兰科维奇所在的病房画了一张图。40名游击队员带着手榴弹和左轮枪执行了这一营救任务。

这事发生后，敌军在全城加强了警戒，兰科维奇无法在贝尔格莱德呆下去了，他去了解放区。铁托也认为没有必要在城市呆下去了，他必须前往解放区，去领导游击队的主要力量。9月16日，铁托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解放区。

在到达解放区之前，铁托的战略轮廓已经形成。

为了贯彻这些战略思想，铁托把集中到了身边的得力干将又派往各地。行为最迅速的是黑山地区，黑山地区是意大利占领区。这里的起义，从7月13日开始，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几个月的功夫，黑山全境被解放，解放区的面积达10000多平方公里。意大利军队遭到重大损失，仅梅西纳师伤亡人员即达5000人。这期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马其

顿、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各地都掀起了武装抗击入侵者的浪潮。

9月26日，在铁托领导下，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在斯托利察村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最高指挥部成员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伊万·米卢蒂诺维奇、伊沃·洛拉·里巴尔，以及各民族的军事和党的领导机构的代表：塞尔维亚的斯雷坦·茹约维奇、菲利普·克利亚伊奇和罗多抑布·乔拉科维奇；克罗地亚的拉德·康查尔和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斯洛文尼亚的弗萨兰茨·莱斯科舍克和米哈·马林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和斯洛博丹·普林齐普·塞利奥。此外，还有拉塞尔维亚西部一些游击队的司令：科查·波波维奇·兹德拉夫科·约万诺维奇、德拉戈伊洛·杜迪奇和奈博伊沙·耶尔科维奇。各地的代表多是骑马或步行到这里来的。只有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指挥员较为幸运——他们乘了火车。有意思的是，他们到达时都化了装，尤其是都带上了假的大胡子。不用说，他们都伪造了通行证。

会议开了好几天，对南斯拉夫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决定：

一、在南斯拉夫每一个省建立一个总司令部，使若干分遣队的活动互相配合；原总司令部改为南斯拉

夫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最高司令部。

二、在南斯拉夫建立新的解放区，扩大现有的解放区。

三、在解放区建立新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以取代旧的政权机构。

四、对游击队的战术作了规定：尽量扩大分遣队的建制，但避免与在数量上及装备上处于优势的敌人进行正面接触；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借助于灵活的行动、相互配合打击敌人；要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使敌人找不到回击的目标；要尽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五、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尽可能争取与“切特尼克”合作。

入侵者一方也有重大军事举措。9月16日，希特勒命令伯梅将军指挥第三师，在空军支援下，对塞尔维亚地区的抵抗力量开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同时，希特勒的参谋总长冯·凯特尔元帅发布指示，要对抵抗力量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

这一指示下达后，在塞尔维亚的克拉古耶瓦茨果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0月18日，游击队在此地的一次伏击中，打死德国士兵10人，打伤20人。为了落实凯特尔的指示，20日，德军把全城大部分16 - 60岁的男子驱入市内的集中营，然后，100人为一组被押出执行枪决。屠杀持续了一整天，

直到德国的行刑队队员感到恶心，使杀戮无法再继续进行为止。总共屠杀居民约5 0 0 0人。

法西斯的这一暴行给米哈伊洛维奇的不抵抗政策提供了“根据”。此事的发生，正好是在他与铁托进行第二次会晤的前几天。

10月27日至28日，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进行了第二次会晤。会晤前，铁托仍然建议他们的会谈地点选在双方司令部的中间地段。对此，米哈伊洛维奇加以拒绝。在此情况下，铁托决定深入虎穴，到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走一趟。

陪同铁托的，有最高司令部成员斯雷坦·茹约维奇和来自门的内哥罗的米塔尔·巴基奇，另外还有8名游击队战士，他们带有手提机枪。这一次他们乘两辆摩托车到达，这些车辆是新近从意大利人手中缴获的。

在司令部过夜时，铁托一夜没有睡觉。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一直呆到天明。

第二天，他们又进行了讨论，但没有达成协议。当天，铁托一行返回乌日策。途中，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当铁托他们到达波热加桥头时，一队“切特尼克”挡住了去路。原来，“切特尼克”在桥上安放了地雷，他们拆除这些地雷需要时间。

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第二次会晤后，游击队与

“切特尼克”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11月1-2日，“切特尼克”部队向乌日策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游击队同时发动进攻。米哈伊洛维奇声称，这些军事行动是下级自发干的。这当然是骗人的。

对于“切特尼克”的进犯，游击队早有准备。铁托迅速调动全部武装力量打击进犯之敌。

事实证明，米哈伊洛维奇严重低估了游击队的力量。他的“切特尼克”被打得落花流水。11月3日，米哈伊洛维奇的参谋长帕夫洛维奇给铁托打电话，提出如果游击队让出波热加，双方即可停战。铁托拒绝了帕夫洛维奇的要求。双方的战斗继续进行，“切特尼克”的败局渐渐显出端倪。

在此情况下，于11月4日，米哈伊洛维奇急电伦敦，说“形势紧迫，急需援助”。第二天，他又向伦敦发电。

11月9日，他得到了空投给他的第一批物资。但英国的支援阻挡不住游击队的攻势。11月12日，游击队已推进到离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仅有一公里的地段，而且从四面八方将米哈伊洛维奇团团围住。

哈米伊洛维奇下令前来增援的部队尚未到达。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陷于一片慌乱之中，电台已经停止发电，文件在销毁，重要物资和档案在包装，司令部准备突围撤出。某些领导人处于精神崩溃之中，瓦

西里像个孩子似地哭起来。他不住地对人们说：“你们可曾想到，德拉扎和我都要被判死刑的。”

在这紧要关头，米哈伊洛维奇进行了他的第四种联系——找德国人求救。11月11—12日，米哈伊洛维奇亲自出马，在瓦列沃附近迪弗齐一家旅馆里与德国人进行了谈判。牵线的是在德军司令部服务的一名南斯拉夫人。米哈伊洛维奇带领3名随从，骑马走了92个小时，到达会谈地点。德国方面参加的是三名军官，其一是德军驻塞尔维亚最高司令部代表科格哈德上校；其二是德国驻塞尔维亚军政司令部代表乔治·基泽尔博士；其三是一名盖世太保官员。

米哈伊洛维奇开门见山，但谈的是“大战略”：双方共同对付共产党人，而一俟共产党被清除，德军立即撤出，而由“切特尼克”接管塞尔维亚。当然，他绝对不会忘记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他提出，眼下他急需武器。作为交换，他可以把手中的360名游击队俘虏交给德国人。德国人的许诺含糊其词。米哈伊洛维奇看出了这一点，因此，感到极度失望。

但等待米哈伊洛维奇的，并不都是坏消息。回到司令部后获悉，他已被王国政府任命为“祖国国内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总司令”。这项任命是11月15日由英国广播公司宣布的。

11月27日，铁托曾给他派出的与米哈伊洛维

奇谈判的代表打电话。米哈伊洛维奇的副手朱里奇少校来接电话时，铁托又敦请他转告米哈伊洛维奇采取共同行动。29日，铁托在德军进入乌日策20分钟前撤离乌日策。前一天，铁托又给米哈伊洛维奇打电话，要求米哈伊洛维奇协助，阻止德军。米哈伊洛维奇明确对铁托说，对德军公开作战是办不到的。他说，“切特尼克”与游击队应该分别撤退到各自认为合适的地区去。

这是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的最后一次接触。也是“切特尼克”与游击队最终分裂的开始。

此后，德、意越加强进攻，“切特尼克”抗战的性质就越弱，而它的反动性也就越强。许多“切特尼克”领导人从德、意和卖国的塞尔维亚奈迪奇政府那里获得武器和经费。在意大利军队对游击队发动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中，“切特尼克”总是站在意军一边，而它们也曾多次与德军“并肩作战”，对付游击队。

临近11月底，形势越来越糟。11月25日，德军开始向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广大地区的解放区发动攻势，即开始实施德军司令部所谓的“乌日策方案”。这实际上是，德军在卖国贼军队配合下，两个月来在塞尔维亚西部和舒马迪亚地区发动的大规模攻势的继续和结束阶段。德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以极强大的兵力从好几个方面向乌日策进攻，以便摧

毁解放区和消灭游击队。

铁托撤出乌日策之后，经由兹拉蒂博尔、乌瓦茨、利姆、德雷诺瓦、新瓦罗什、卡西多尔、鲁多、梅杰杰、梅西奇，最后在罗加蒂察安顿下来。乌日策的撤退使铁托有了经验，也接受了教训。

建立人民的军队无疑是正确的。“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说明，建立游击战的根据地也是正确的。“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为建立人民的政权组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现有的游击队的组织形式暴露了军事上的弱点。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地域性游击队，无论在作战指挥方面，还是在调动方面，都暴露了很大的局限性。各个分遣队直属最高指挥部，这种在战场上没有垂直指挥的组织系统，对于战场配合是十分不利的。分遣队的地域性，影响了全国一盘棋的原则的贯彻，表面上看有利于地域，实际上在保不住全局胜利的情势下，地域的利益最终也是靠不住的。

铁托做了考察，从乌日策撤出后，“跟上了”最高指挥部的部队。这支部队是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的工人组成的。这使铁托萌发了建立一支可以在全国各地作战、以解放全南斯拉夫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战斗部队”的念头。当然还需建立新的根据地。

铁托分析了政治军事形势，决定首先要建立西塞

尔维亚解放区。为此，要尽快地拿下这一地区的一座合适作“首府”的城市。第二，要建立“无产阶级战斗部队”。

铁托与政治局同事们商量，把解放区的首府定在福查。而福查尚在敌人手中。铁托考虑再三，决定把攻占福查的任务，交给正在波德罗曼尼亚指挥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游击支队的科斯塔·纳吉。

科斯塔·纳吉曾被铁托派遣到西班牙，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抗战爆发后，他担起了指挥地方游击队的重担。科斯塔被召到罗加蒂察最高指挥部。他是第一次见到铁托，铁托的作风很容易吸引像科斯塔这样的有革命责任感、肯于思考、干劲冲天的人。

铁托答应调两个营，归科斯塔指挥。出人意料的是，福查没有费什么劲儿就到了游击队之手。原来，德国人在游击队到达之前即放弃了福查。而“切特尼克”捷足先登，先于游击队进入福查市。可等游击队向福查进发后，占领福查的“切特尼克”指挥官闻讯率部抱头鼠窜了。

科斯塔进城时，目睹了极为惨痛的景象。大街上血迹斑斑，德里纳河与切霍蒂纳河上漂着尸体。“切特尼克”杀掉了2000余名穆斯林，克罗地亚人也遭到了杀戮。如果不是游击队及时赶到，会有更多的居民，尤其是穆斯林，惨遭杀害。

穆斯林把游击队当成了救星。老人揭去了面纱，跑过来，吻科斯塔的手。还有几个妇女吻了科斯塔坐骑的马蹄。科斯塔赶紧下马，又有两名伊斯兰教徒跪在了他的面前。科斯塔急忙将他们扶起。

随后，铁托与最高指挥部进入福查。科斯塔提出，要在福查久呆，必须解放卡利诺维奇，因为那里由意大利的800名军人据守，是对福查的严重威胁。铁托接受了科斯塔的建议，并派科斯塔率部前往，解决那800名意大利人。

铁托在福查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军队的建设与根据地的建设是被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的。此时，铁托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第一旅。

最高指挥部给游击队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纪律。这些纪律不但适合于无产阶级第一旅，而且适合于各级分遣队。在对于老百姓和两性关系的态度方面，纪律规定尤其严格。对于抢劫和偷盗，即使情节很轻，也要处于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军队中，男女并肩战斗，彼此关系密切，但绝不允许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现象的发生和存在。所有这一切，都使游击队形成了一套光荣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不但使军队具有了顽强的战斗力，而且对赢得人民的爱戴和依赖，对形成鱼水般的军民关系，起了决定性作用。

游击队的重要特征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组织。它实际上是党反抗侵略、做群众工作、开辟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的有效工具。解放区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而解放区与游击队相互为依托。

解放区普遍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解放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人民政权。1942年，解放区的这种人民解放委员会已有成千上万。以前的所谓“乌日策共和国”，就是由诸多的、各级人民解放委员会构成的解放区人民政权。

在福查，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比在乌日策时又有了发展。在这里，凡是支持抗战的人都可参与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当然，由于是战争环境，条件极其艰苦，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重要职务大都由共产党员来担任。妇女得到了解放，她们与男青年一起在委员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和其他人也有自己的事干。人民解放委员会最难处理的工作是吃住问题。因为绝大多数解放区都有为数不少的难民。卫生工作也占去了委员会大量的时间。因为吃住也好，卫生工作也好，往往与军事问题，有时甚至与政治问题连在一起。在解放区，人们会到处发现墙壁上刷有这样的大字标语：“勤洗衣、勤理发、勤灭虱，你就不会得伤寒病”。伤寒病是解放区军民的大敌，大家知道它的厉害。

人民解放委员会还负责包括收税在内的一切行政管理工作。在委员会的领导下，交通设施得到了恢复，被焚毁的村庄得到了重建，地方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恢复。一切资金均由委员会自筹。

军民关系的处理，在“民”的一方由委员会负责。他们要保证游击队必要的给养，粮食调剂余缺是委员会最棘手的工作之一。高一级的委员会负责从某一地区把余粮拨到缺粮的地区去。这一工作有时要有多个委员会进行协调：从农民那里买到粮食，要长途跋涉运往缺粮区，有时甚至要穿越敌占区。有时资金不足，在购买农民粮食时不得不打“白条”，委员会保证战后付款。后来证明，所有“白条”，战后国家全部付清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还不放松教育工作。这里既有狭义的教育，即组织老百姓，尤其是青年读书认字；也有广义的教育，即政治教育，以争取人民对当前运动和长远目标的支持。

科斯塔又被召到福查。这时，最高指挥部已经在福查呆了两个多月。

铁托告诉科斯塔，眼下，最高指挥部要利用在福查的这段时间，来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建立人民政权。铁托说：“我们还在起草基本准则，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原则，规定这些委员会的性质职责。这不仅适用于解放区，而且适用于全国。”

铁托向科斯塔及在座的人谈了6个月来斗争的实践。他说，6个月的实践表明，武装起义从来没有降低到“游击运动”和“抵抗运动”这样的水平，因为这里展开的是共产党组织的、具有深远目标的起义和无妥协可言的解放战争。

最后，铁托告诉科斯塔·纳吉，最高指挥部调科斯塔到波斯尼亚西部的克拉伊纳地区去，指挥并发展那里的军事力量，建立并扩大解放区。科斯塔本人就是克拉伊纳人。

到1942年3月底，德军发起把福查为中心的解放区作为主要进攻目标的第三次攻势。最高指挥部已经直接指挥着5个无产阶级旅。而全国的游击先遣队合在一起，人数已达10万之众。

福查保不住了。

游击队撤退的生活和作战环境越来越艰难。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年初以来，铁托向莫斯科发出一封封求援电报，盼望能通过飞机送来军火、药品和御寒服装。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技术困难很大”。莫斯科要铁托“设法从敌人那里取得武器”。

游击队撤退行进的地区全是山区。没有粮食，没有油脂，没有蔬菜，没有水果，也没有盐。大家吃得最多的是清水煮羊肉。

最高司令部到达苏杰斯卡河的河谷地区才暂时安

顿下来。这里的自然风光十分美丽：四周全是高山，山上白雪皑皑。水从山顶流下来，流过1000米的高度，注入盆地。

但是，人们在村子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景象。这里是穆斯林居住区。村里的居民已被“切特尼克”杀光，房子已被烧尽。全村留下的是断垣破壁，丛生的杂草。游击队找不到一个活着的人，没有谁跟战士们说上一句话。这给战士们留下了恐怖的感觉。最高司令部到达一个小山后，决定休息片刻。

从附近的一处清泉方向传来铁托的声音。大家凑了过去。原来这里有一间小磨房，5英尺高。这是游击队走了几十公里所碰到的唯一一间保存完好的房子。

铁托走了进去。他看了看，石磨未遭破坏。铁托打算修一修它，让它转起来。大家看着铁托动手。半小时不到，轮子启动了。在一片荒凉中，小磨房发出了“哒哒……”的声响，大家不由地跳了起来。

当天晚上，最高司令部开会作出决定，率领游击队5个旅向西作一次长征，目的地是远离此地200英里的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行军的路线是沿德军和意军占领区的交界线。

游击队在靠近萨拉热窝的铁路沿线，缴获了许许多多的火车。车上的货物也落入游击队之手。行至布拉迪纳时，缴获了一列货车，并俘虏了不少乌斯塔沙

和意大利士兵。车皮里装有面粉、蜂蜜和樱桃。不用说，游击队得到这些给养感到喜出望外。

游击队的进攻完全出于敌军的意料之外。当德意的将军们在讨论究竟由谁出兵、在哪里实施攻击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城市落入游击队之手。游击队不但扩大了解放区，而且壮大了队伍，沿路上，成百成千的新战士参加了无产阶级旅。

满有意思的是，游击队在这次转移中还建立了自己的空军：行进中，游击队在敌人一个机场上缴获了3架德国轻型轰炸机。游击队中不乏人才，很快找到了自己的驾驶员。几天后，游击队的飞机第一次飞上了蓝天。敌人绝对没有料到飞机改换了主人。而等炸弹落在他们的阵地上、他们挨了炸之后，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游击队方面没有足够的汽油，也没有多少炸弹。大家知道在当时形势下，游击队无法长期保存这些飞机。事实也是如此。没几天，德国的飞机就找到了它们，并一举将它们炸毁在机场上。但游击队拥有飞机这件事，毕竟鼓舞了士气。

随着游击主力作战部队的转移，最高司令部也逐步向前推进：库伦——瓦库弗——普罗左尔——青察尔。

铁托一直没有忘记科斯塔·纳吉。几个月之前，

铁托已经把他派到了克伊拉纳地区。铁托打算拿下亚伊策，做为最高司令部在此开辟大片解放区的奠基礼。他不想动用无产阶级旅，而要地方部队，让科斯塔来完成解放亚伊策的任务。

9月28日，铁托在科斯塔等人的陪同下，进入亚伊策。

晚上，科斯塔为庆祝亚伊策的解放，为铁托的到来，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客厅里放着一排长桌，上面铺着洁白的餐布，餐具都是银制的，而客厅的墙壁上挂的铁托的大幅照片最为醒目。

铁托提出，要在十月革命节前攻下比哈奇。科斯塔定于11月2日发起总攻。他投入的兵力是：8928名战士，6789枝步枪，328挺机枪，51挺重机枪，15门迫击炮，一台波德格尔梅奇造火焰喷射器，足够的手榴弹。

11月3日清晨，司令部下达了“不停顿地继续进攻”的命令。太阳出来了，天气放晴。这对进攻并不是有利的，敌人可能出动飞机进行增援。

11月9日，铁托发布命令：从波斯尼亚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中，组建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第一突击队。归入该军建制的，为人民解放第四和第五突击师以及东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第六突击旅。科斯塔·纳吉为该军军长。

1 1月26日到27日，在比哈奇，由铁托主持召开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会议。这次会议，铁托酝酿已久并实地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大会在比哈奇一所女修道院的大厅里举行。会场上饰以旗帜，并有一幅“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大幅标语。与会者有来自南斯拉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游击队及其支持者的代表，也有南斯拉夫战前某些党派的成员。会议没有宣布成立政府，但选出了人民解放执行委员会，它实际上具有政府的职能。老政治家伊丹·里巴尔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主席。会议激起了游击队和解放区人员的巨大热情。

1943年1月，敌军对游击队发起了新的进攻。参加这次进攻的，有德军第七党卫军师团、第七一四师团以及意军第五兵团等。进攻的目标是为山林地形的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敌军从四面八方解放区合围，妄图消灭游击队主力。

这时，游击队的军事力量又有了新的发展，无产阶级旅发展成为师。1月27日，铁托的最高司令部已经撤至德瓦尔。一到德瓦尔，铁托便召开了指挥员会议，会议决定，面对敌人来势凶猛的进攻，最高司令部要避敌锋芒，回师东波斯尼亚，实现在南斯拉夫中心地域开辟、发展的战略。

铁托特别向科斯塔·纳吉布置任务：率部固守阵

地，牵制敌军，保证回师的作战部队进攻的攻势，同时，争取时间，保证老百姓和伤员的撤出，尔后率部与敌周旋。

最高司令部直接指挥无产阶级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师东进。各师得到明确指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避免阵地战。具体作战方案是：突破敌人包围，趁敌在运动之中，即刻解放完全被敌人占领的赫格戈维纳和门的内哥罗，把敌人的进攻转变为游击队的进攻。

形势是严峻的。1月31日，铁托又一次向莫斯科发电，要求得到物资援助。但得到的答案更加令人失望。莫斯科回答说，“因无法克服的困难”，援助不能进行。看来，铁托只好靠自己了。

7月18日，科斯塔·纳吉收到铁托的一份电报。铁托告诉科斯塔，让他于7月的最后一天在波斯纳河左岸迎接最高司令部。他还规定了碰头的具体地点。科斯塔明白，铁托等最高司令部成员回来后要驻扎在他的作战区域了。科斯塔骑了一天的马赶到了碰头地点。

在弗拉希奇山麓，科斯塔遇到了无产阶级第一旅的先遣部队。有些战士认识科斯塔。科斯塔发现，战士们脸色发青，也变老了。他们衣衫褴褛，光着脚。

铁托正坐在一棵砍倒的毛榉树的树干上。他低着

头在想什么。他的女秘书兹登卡拿着纸笔，站在铁托的身边，在记着什么。稍远处，在河岸边站着几名英国军官。年迈的作家纳佐尔也在那里。他正靠在一只背包上打瞌睡。

弗拉吉米尔·德迪耶尔最先看见了科斯塔。他叫了科斯塔的名字。铁托抬起头来。科斯塔看到，铁托瘦了许多，脸变小了，满是皱纹。科斯塔看到铁托的脸后，感觉到，这仿佛是一张反映各种艰难困苦的图片，在这张图片上看到了一切：在奈雷特瓦河上努力寻找出路，在皮瓦山、杜尔米托山、苏捷斯卡河率部突围

……

在紧张地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的过程中，铁托收到了莫斯科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通知。通知是以征求意见的形式发给各有关党的。铁托回复了莫斯科，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考虑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后，表示对这项建议及其理由完全同意”，并“感谢共产国际的帮助，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众性政党”，表示今后“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不顾一切牺牲，继续履行它对人民的义务，进行反对法西斯、争取南斯拉夫各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斗争”。

冬天要到来的时候，铁托从自己的情报系统得到

消息，说轴心国一成员“出了毛病”。经判断，是意大利人准备投降。铁托没有从盟国方面得到这个情报。

铁托为此做了准备。无产阶级第一师被派往达尔马提亚，无产阶级第一旅被派到斯普利特，无产阶级第二师被派往黑山。在意大利宣布投降后，这些部队迫使意军15个师向游击队缴了械，还有不少意军俘虏参加了游击队。达尔马提亚全境解放。这时，游击队已发展到30万人，南斯拉夫一半的国土获得了解放。人民对反击侵略的胜利，已经充满希望。

1943年11月6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当时，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设在亚伊策。当天晚上，密洛凡·吉拉斯收听到了莫斯科电台的信号。著名播音员列维坦正在播发斯大林关于基辅解放的命令。基辅的解放是令人欣喜若狂的大好消息。吉拉斯动了感情。他跑上了亚伊策的一个塔顶，按照门的内哥罗人宣布好消息的传统方式，朝天放了三枪。战士们也听到了基辅解放的消息。继吉拉斯之后，大家也开始鸣枪。先是手枪，接着是步枪和机关枪，最后枪声响彻了全城。

1943年11月29日至30日，铁托在亚伊策召开了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从政治策略上来说，这次会议是绝妙的一着，甚至超过比哈奇会议，

为的是在战后南斯拉夫政府讨价还价之前先确定和加强铁托的地位。回顾起来，这可以看作是这场政治革命中一个决定性阶段的开端。铁托当时并不知道，1943年8月魁北克召开的盟国会议已经达成协议，将以有限的空投和海运以及少量的突击兵力援助“巴尔干游击队”，但他知道英国对他的活动已经改变了态度。他期望盟国有可能在巴尔干半岛登陆，愿意与他们联合行动，但不愿让他们取而代之。他深知王国政府和米哈伊洛维奇的政策一直是按兵不动，坐待战争后期参加盟军作战，从而得以重新上台。他不打算在国际领域的斗智中输掉，以致丧失他的运动已在南斯拉夫赢得的地位。

铁托获悉盟国领导人准备举行会议，当即电请季米特洛夫通知苏联政府，游击队运动既不承认流亡的南斯拉夫政府，也不承认国王。“我们不允许他们到南斯拉夫来，因为那就意味着内战”。他声称现时代人民的唯一合法政权是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是亚伊策会议预定要作出的基本决定。关于正在撰写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他事先既未通知季米特洛夫，也并未请求俄国人许可，虽然他还是谨慎地就有关组织问题征求了意见。他想让西方盟国，也让俄国人面对着一桩“既成事实”。这并不难，因为苏联和西方当时都全神贯注于与亚伊策几乎同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的准

备工作。

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是铁托一生事业中最得意的时刻之一。会上洋溢着成就斐然和胜利在望之感，既未受到盟国干预也未出现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由于亚伊策当时是正式属于克罗地亚这个卫星国的一个地区，会议使人有一种对德国人成功地进行挑战的感觉。铁托带着一批人员在該城以两个月的时间为这次会议作准备。他的司令部设在一个木房子里，附近就筑有地下室，以备德国人发觉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增加空袭时用作防空掩蔽部。他此时 51 岁，两年来不断奔波，备受艰苦，加以长期食物不足，使他异常消瘦。由于日晒雨淋，饱经风霜，时而又在防空洞或临时掩蔽所内长时间办公，他面色蜡黄，脸皮紧绷在颧骨下。但他精力仍然极其充沛，工作起来几乎比任何下属人员都更能持久，小睡片刻便又精神焕发——这种本领他一直保持到老年时期。

这次会议，宣告一个全国性的临时政府的成立。这个政府要组成它的拥有全权的主席和执行委员会。它宣布自己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以代替国王和王国政府，它们原先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合法权利已告无效。这些决定均纳入一项决议，全体一致通过。反法西斯会议行使政府权力，其成员迅即选出。铁托当选为主席兼国防部长，并被授予元帅衔。\$

这次会议还通过一项决定：向美国政府发出冻结南斯拉夫黄金储备的请求。这些黄金是法西斯进攻前夕，为了免被希特勒掠夺，由王国政府运往美国的，而现在流亡政府正想把它充当私人财富而动用。

人民委员会不但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权机构，而且成为人民阵线的最好形式。除铁托被选为主席和国防委员外，共产党员卡德尔被选为副主席。而几个重要的“民主人士”在委员会中占了重要位子：从起义一开始就参加了游击队的民主党党员伊万·里巴尔博士被选为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的主席；斯洛文尼亚天主教教权主义党的领导人、1932年曾任斯洛文尼亚省省长、抗战后参加了游击队的杜奇·塞尔内奇被选为人民委员会财务委员；而他的父亲、曾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切特尼克”司令官、后投入游击队的弗拉多·泽契维奇神父当选为内务委员；著名雕刻家安东·奥古斯丁契奇则当选为副主席。

铁托事先没有就亚伊策会议问题请示莫斯科，也没有就会议的主要内容事后向莫斯科进行汇报。莫斯科是从发表的大会决议了解到这一事实的。

莫斯科大为恼火。设在莫斯科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被勒令不许广播大会决议，尤其不许广播禁止国王回国的消息。南斯拉夫驻莫斯科代表、负责“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维利科·弗拉霍维奇受到了训斥。

人民委员会的建立也使西方大吃一惊。不过，斯大林也好，西方也好，都很快平静了下来。

对西方来说，他们承认了现实，从南斯拉夫的力量对比看，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铁托领导的运动相匹敌。另外，按照西方惯常的思维，他们认为，铁托的这大大动作，必是在莫斯科的指导下，至少是默许下进行的。西方在当时的形势下无意因这点小事而进行交涉，弄得苏联不快。因此，西方的评论不但不是强烈敌意的，反倒是带点友善的。

苏联原怕铁托的干法得罪西方，影响苏联与西方的关系，而现在见西方如此反应，也就来了个顺水推舟。

12月14日，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终有以下声明：\$

苏联政府认为，已经得到英国和美国谅解的在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将有助于南斯拉夫人民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这些事件证明了南斯拉夫的新的领导人在团结南斯拉夫人民的一切力量的事业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第二次会议为缔造新国家奠定了基础，整个局势使不久即可结束的抗敌斗争出现了希望。为了这些，铁托本人感到异常兴奋。但是，就在这令人高兴的时刻，铁托心中还有巨大的

悲伤。

1 1月27日，洛拉·里巴尔受命出访，乘飞机从格拉莫奇简易机场出发，前往开罗。他出访的身份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驻盟国司令部代表，出访的目的，是要求盟国方面保证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定期提供粮食、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不幸的是，在飞机起飞前，飞机被敌机发现。敌机径直飞来，向洛拉所乘的飞机连续投弹。硝烟散后，人们发现洛拉躺在被炸毁的飞机旁，他已经牺牲。

噩耗立刻传到亚伊策。铁托第一个得知了洛拉·里巴尔牺牲的消息。他陷入无限的悲哀之中。

1 1月30日傍晚，最高司令部为洛拉举行葬礼。包括铁托在内的洛拉生前的战友都站在他的墓边。

铁托判定，亚伊策并不是最高司令部理想的驻地。铁托决定将司令部迁往德瓦尔。德瓦尔在亚伊策与比哈奇之间。游击队认为，它不但地理位置好，而且较为安全。先前，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曾在此驻扎。它坐落在山谷之中；北面，亚塞诺瓦茨山脉峻峭陡立；南面，群山巍巍，林木繁茂。这里选为最高司令部驻地是合适的。

最高司令部于1944年初到达德瓦尔。随最高司令部到来的，有英国军事代表团，以科尔涅夫将军、巴尔斯科夫将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是早些时候直接到

达德瓦尔的。英国军事代表团驻在离德瓦尔不远的一家农舍里。苏联军事代表团也住在乡下，离城更远些。

来到德瓦尔的，还有几名外国记者、萨格勒布芭蕾舞团的几名演员以及来此与铁托一起商讨国事的新成立的人民解放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游击队的主力驻在城市周围，皆与最高司令部有一定距离。铁托的住所在城外离城不远的地方，四周警备森严且坚不可摧。出入通道唯有一条沿乌纳茨河的小径。这里岩陡壁立。有一处天然裂口，裂口之内装有木梯，拾阶而上，便是一处豁然开朗的“庭院”。“庭院”四周，皆为天然岩洞。能工巧匠趁势在岩洞中开辟了若干房间。铁托住的那个房间，还有一个不小的“阳台”。站在“阳台”之上，可以俯视山谷内外，美景尽收眼底。他的住室，除讲究的“阳台”外，还有巨大的支撑木柱梁，四壁镶有隔板，挂着用降落伞绸料制成的漂亮窗帘，办公桌的上方壁上，挂着英国人绘制的巨大的南斯拉夫军用地图。他的工作量越来越大，除国内政治、军事诸事之外，还要处理越来越多的与盟国关系方面的事务。

5月25日是铁托52岁寿辰。城里正准备庆贺活动，一派繁忙气氛。5月23日，铁托应邀参加游击队反法西斯青年运动召开的一次集会，并向青年们讲了话。

铁托于当天托去萨格勒布的交通员把一张寄往家乡、向父老乡亲问候的明信片送往邮局，尽管他的家乡库姆罗维茨依然是敌占区。

几天来，德瓦尔上空每天都有德国侦察机频频出没。5月23日，一架单机在山谷中上下盘旋多时，显然是在进行空中拍照。英国军事代表团向铁托发出警告：德国人正在准备对德瓦尔进行袭击。

早在1943年11月，来自萨格勒布的特工人员就曾报告：德国人正在准备空降部队，目标是歼灭游击队设在亚伊策的最高司令部。但事情过去了半年多，却不见敌人这方面的动静。这麻痹了最高司令部和铁托本人。

5月25日清晨6时35分，铁托起床后便从窗子里看到了德国人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群。它们吼叫着，低空飞向镇内的目标，顿时城中多处中弹起火。

7时左右，又有40架“容克——52”巨型飞机，空投下了大批伞兵。10分钟后，又由滑翔机群带来携带机枪手的德军。

9时左右，德军占领了大半个城镇，因为城里没有游击队的作战部队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区委员会的6名成员被德军包围在一个院子里。德国人开始向他们劝降。他们决心战斗到底，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他们捡起德国人投来的手

榴弹向敌人投了过去。最后他们全部壮烈牺牲。

乌纳茨河右岸的德军推进缓慢，因为他们遇到最高司令部和处于此地的军官训练学校师生的顽强抵抗。

最高司令部已经向可能赶来的游击队下达了增援令。英国军事代表团向巴里岛的盟军发出急电，请他们派空军前来援助。距城市最近的部队是第六利卡无产阶级师，有12公里的距离。他们接到命令后，跑步前来，于9时左右赶到。

中午时分，德国人又空投了增援部队，战斗激烈进行。夜幕降临，游击队的增援部队全部赶到。

次日凌晨3时，战局已明朗化。

25日正午，铁托与司令部人员均已安全脱身。那时，德军伞兵的一个班前进到最高司令部的洞口。德国人向洞口射击，把出口封锁了。铁托在办公室的地面上打了一个洞。洞的下面即是山谷。他们放下一条绳子。绳子一直垂到河床。他们抓住绳子，攀缘而下，到达河床，然后快速涉河，到达彼岸，进入一片果园，出果园后，寻到通往波多齐的小路，从而逃脱。

游击队方面的领导人全部脱险。来访的外国人也大多逃出。只有一名美国摄影记者和一名英国记者被德国人俘获。铁托他们与英美及苏联的军事代表团人员一起，几个晚上都在不停地转移，因为敌人的摩托化部队从四面赶来搜寻他们。盟国的空军从26日对

游击队进行了空中支援，它们不但打击德军，而且给游击队空投了给养。一周之时，盟国空军出动1000架次以上。

1944年6月3日，铁托从姆利尼什特附近的一个临时机场乘飞机飞往意大利的巴里岛。铁托在巴里城外的一座别墅里停留了两天。这期间，他与英国空军参谋长约翰·斯莱塞爵士就南斯拉夫游击队得到英国空军的支援一事进行了会谈。6月6日，铁托在夜间登上英国皇家海军的“布莱克默”号猎人级驱逐舰，渡海前往维斯。

维斯是处于亚得里亚海距南斯拉夫陆地约50公里的一个小岛。这里怪石嶙峋，奇峰突兀，四周靠海处是低缓的平原。维斯岛上集中了“共和国”的首脑机关：南斯拉夫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还有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妇女阵线以及南通社，等等。

铁托等最高司令部成员住在被当地居民称作“女人头”的地方。“女人头”是一个小山包，山包自然裂开，在裂缝的两边，是一些深浅不同的岩洞。工兵将岩洞挖深。有的成为铁托等人的住屋和会议室，有的当作防空掩蔽所。山洞外，绿荫如盖，环境幽美。

山洞的四周都堆满了沙袋，再往外，是机关枪阵

地。可以说，“女人头”确实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岛上还有足够的驻军，除南斯拉夫军队外，经铁托要求，英国还有一个旅的防空军长年驻扎着。实际上，德军从来没有来打扰过铁托。

坚持独立自主

这时铁托的游击队经过十几个月的孤军奋战后，终于与西方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与苏联的联系也有加强之势。在1943年，铁托主动采取了两方面的行动：一是向英国派一个代表团。赴英的军事代表团在洛拉·里巴尔牺牲后，由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率团。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率团前往开罗。英国方面由派驻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军事代表团团长麦克莱恩准将与之对口会谈。

此时，丘吉尔去德黑兰途中路过开罗。麦克莱恩便有了向丘吉尔本人汇报的机会。这次，丘吉尔对与游击队关系的发展问题采取了积极态度。

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一致同意“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规模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装备，并且派遣突击部队给予支持”。

据此，韦莱比特留下来与英方就提供援助事磋商细节，麦克莱恩则带着丘吉尔给铁托的一封信，赶到南斯拉夫。

1944年3月，铁托决定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代表团由吉拉斯任团长。

代表团的一个任务是安排好苏联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援助。同时，铁托指示，代表团通过苏联政府或其他途径为南斯拉夫的解放区获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同时，还要向苏联政府要求20万美元的贷款，来抵补南斯拉夫在西方国家的使团的开支。铁托强调说，应当向苏联政府申明，当国家获得解放的时候，将如数偿还贷款以及武器和药品的援助。使团还负责携带最高司令部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文件，将它们保存在莫斯科。

最重要的是，代表团必须探明苏联政府有没有可能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合法的临时政府，并在这个问题上对西方盟国施加影响。代表团将通过苏联使团与最高司令部保持联系，它还可以利用共产国际原来的途径，与最高司令部保持联系。除了这些任务之外，在代表团动身时，铁托还嘱托吉拉斯从季米特洛夫或者斯大林那里了解一下，对南共的工作是否有什么不满。

且说铁托收到丘吉尔一封电报。电报说国王彼得的代表伊凡·苏巴塞奇博士将到维斯岛来。

伊凡·苏巴塞奇于1944年6月来到维斯。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陪同他前来的，有英国驻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苏巴塞奇带来一个关于未来政府组成方式的建议。建议说，铁托领导

的人民委员会应当与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合并。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铁托的山洞里举行。在这个洞里刚刚举行了人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英国大使史蒂文森陪同苏巴塞奇一直到山洞口。到达洞口后他回到了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菲兹罗伊·麦克莱恩准将的房子里。苏巴塞奇首先发言，他开头就讲，根据1931年宪法，国王彼得是南斯拉夫一切武装力量的实际领导。

游击队方面，爱德华·卡德尔首先发言，铁托、巴卡里奇和其他人相继讲话，他们拒绝了苏巴塞奇的建议。最后，人民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秘书长、年老的达耳马欣人约西普·斯莫达拉卡对苏巴塞奇的声明讥讽了一番。

斯莫达拉卡提醒苏巴塞奇注意：他已经忘掉了人民委员会。而在一个国家里，在两个政府之间作出安排是不可能的。这里更谈不到联合司令部的问题，“因为你们没有军队”，这种安排是牺牲游击队员。“因此，你们不会在人民中间听到任何赞成的声音”。

会议到此休会。苏巴塞奇和卡德尔退出会场转入秘密会谈，通过长时间的艰苦的商谈，他们终于谈成了。苏巴塞奇提出的所有的方案差不多都被拒绝，而人民委员会所有的要求几乎都得到了满足。最后签订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苏巴塞奇代表王国政府承认人民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唯一当局，在铁托领导下的

人民解放军是唯一的军队。协议谴责一切公开地或隐蔽地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协议同意在伦敦成立一个新的内阁，并将内阁扩大以容纳民主人士。

一天，盟军地中海司令威尔逊将军邀请铁托到意大利的卡塞塔去访问他。据悉，国王彼得正在意大利。存在着铁托将面临既成事实的可能，即存在着在他访问威尔逊将军时被迫同国王彼得见面的可能。

铁托决定，他不在这个时候访问威尔逊将军。这使威尔逊的司令部大为不满。访问推迟至8月10日，同威尔逊将军的会见是非常正式的。威尔逊将军给人的印象，与其他在意大利的盟军司令，如亚历山大将军或美国埃克将军大不相同。南斯拉夫人觉得威尔逊将军的举止行动有些冒犯他们。在威尔逊将军为铁托举行的午宴上，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意大利侍者在上菜，身佩冲锋枪的铁托的两名卫兵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这些侍者，因为他们听见一个侍者讲塞尔维亚语。他们怕这可能是曾随同占领军到过南斯拉夫的法西斯分子，担心铁托遭到暗算。在午宴上，卫兵们拿着冲锋枪站在铁托的近旁，这种情景是令人不愉快的。主人首先轻轻的一笑，铁托也跟着一笑，午宴上全体人员都笑了。这时，铁托要他的卫兵退了出来。

当天晚上，美国十五航空队司令埃克将军在他的司令部为铁托举行了招待会。铁托也接到了第八军司

令亚历山大将军的邀请，他请铁托到罗马北博尔塞纳湖附近前线他的司令部访问。铁托乘飞机同麦克莱恩将军和他的卫兵一起前往，飞机沿途在意大利各个战场上空盘旋而行。

铁托从罗马回到那不勒斯。8月12日他在那不勒斯会见了温斯顿·丘吉尔。这是铁托第一次与丘吉尔见面。铁托一向注意衣着，这一次，他穿了一件崭新的、紧紧绷在身上的灰色军服，裤子上缀有一道深红色条纹，军服上则饰以金黄色穗带以及元帅军衔的标志。当时，丘吉尔则穿了一身白色的工人装。

会谈在曾经作过维多利亚王后的别墅里举行。第一次会谈只有铁托、丘吉尔和一个译员参加。以后南斯拉夫方面参加的有茹约维奇等。会谈开始是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

丘吉尔首先赞扬了南斯拉夫游击队。接着，丘吉尔说，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年岁已大，不能在南斯拉夫跳伞着陆了，不然的话，他将到南斯拉夫去作战。

转到国王彼得的问题时谈话就不那么轻松了。丘吉尔问铁托，他可否同国王见面。铁托引用了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谈关于不准国王彼得回国的决议。他强调说，彼得国王因为战时的所作所为已失众望，现在不应该做任何削弱对敌斗争的事情。丘吉尔又问铁托，如果别处不行，他是否可以在军舰上会见国王彼得。

铁托回答说，他不反对到军舰上会晤丘吉尔，如果国王彼得在场，他也可以同他见面。

在谈话过程中，丘吉尔突然问铁托是否要在南斯拉夫建立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铁托回答说，苏联的经验是有用的，但我们应该考虑我们自己的情况。他说：“我们并不想把任何这样的制度强加于人民，这一点我是经常公开讲的。”丘吉尔继又谈到：塞尔维亚的情况是不同的，那里的农民不喜欢游击队而愿意要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因此，应该给塞尔维亚人民表示他们的自由意志的机会。斯大林在农民问题上碰到了最大的困难，等等。

丘吉尔又问铁托，战后在南斯拉夫是否允许个人自由。铁托说：“我们的基本原则始终都是民主和个人自由。”

丘吉尔又问：“在南斯拉夫允许不允许罢工？”

“只要战争还在进行，就不许可。”铁托说。

他们也谈到了伊斯的里亚半岛和的里雅斯特问题。

丘吉尔还问铁托，如果盟军在伊斯的里亚建立桥头堡，通过南斯拉夫北部朝着卢布尔雅那山口方向进攻中欧的话，游击队能否给予配合。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铁托答道：“能，我们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均有军队，他们一定会给予协助。”

丘吉尔随后把铁托领到他的图书室，给他看盟军

前线作战地图。

英国首相问铁托，他愿不愿意同他和王国政府首相苏巴塞奇合拍一张照片，铁托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拍照时，丘吉尔让铁托坐在他的右边，把苏巴塞奇安排在左边。铁托对丘吉尔说：

“首相，你是否弄错了？你的保守党看到这张照片会生气的。你把一个国王的首相安排在你的左边了。”

丘吉尔哈哈大笑，就让苏巴塞奇坐在了右边。同一天，英国首相为铁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在第二次同丘吉尔的会谈中，铁托接到最高司令部的报告说，南斯拉夫第二、第五和第十七师已经深入到塞尔维亚，在科帕奥尼克山上击溃了德国人、保加利亚人和“切特尼克”，与塞尔维亚师在托普利察会师了。以后仗打得很好。游击队一直向萨瓦河和多瑙河推进。铁托立即命令第五和第六无产阶级师的其他部队以及第十二军进入塞尔维亚。

与丘吉尔会谈后，铁托回到了维斯岛。这时，苏联红军在罗马尼亚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不久，击败了罗马尼亚境内的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直捣多瑙河。他们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会师的日子正在迫近。9月6日终于会师于多瑙河。

9月份，铁托决定到苏联去同苏联商谈红军和人民解放军协同作战的问题。当他把他的意图告诉苏联

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夫将军的时候，苏联人显然感到高兴。科尔涅夫满意地说：“非常令人高兴的消息。谨请对你动身的日期严守秘密。”

在英美军事人员鼻子底下进行“密谋”并非易事。然而，这次行动终于“密谋”成功。铁托在9月21日夜11时登上一架“达科他”式运输机，飞机由苏联驾驶员驾驶。夜色黝黑，从维斯小机场上起飞遇到困难。铁托得先穿越南斯拉夫到托尔布欣元帅的司令部所在地克拉若瓦，然后飞往莫斯科。科尔涅夫将军、最高司令部的伊凡·米卢丁诺维奇和他的秘书米塔尔·巴基奇陪同前往。

飞到罗马尼亚一路无事，虽然他们所飞经的几个城市仍然在德军手里。进入保加利亚领空之后，因距前线仍然很近有受敌机攻击的危险，飞机由战斗机护航在白天飞行。阔别5年后，铁托又来到了莫斯科。这次不是以一个躲避警察追捕的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而来，也没有用伪造的护照，而是用他的全名，以南斯拉夫元帅、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而来的。在他后面的，是经过了5年的艰苦斗争、团结在人民解放运动内的南斯拉夫绝大多数人民。

铁托离开后，英国人向丘吉尔报告“铁托失踪”。丘吉尔知道真相后十分恼怒，苏联方面出面向丘吉尔做了解释。莫洛托夫对丘吉尔说：“对于一个巴尔干

农民，你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

铁托返回南斯拉夫时，贝尔格莱德战役已经开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一师、第五师、第六师、第十一师、第十六师、第十七师、第二十一师、第二十八师和第三十六师组成的第一军团，在日丹诺夫将军指挥的苏联红军第四摩托机械化军的支援下，向驻守的德军实行了猛烈的攻击。敌人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役进行了6天，最后，贝尔格莱德获得解放。

1944年10月27日，即亚伊策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第二次会议召开一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在贝尔格莱德近郊离德国人杀害了3万人的巴尼察集中营不远的地方，铁托检阅了参加解放贝尔格莱德战役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部队。1941年组建的第一无产阶级旅走过检阅台，接着是贝尔格莱德营。第一无产阶级旅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有名的“种子队”，贝尔格莱德营也有光荣的经历和赫赫战功，这个营从塞尔维亚出发，几乎打遍了整个南斯拉夫。1941年组建时参加作战的人，到这次在贝尔格莱德接受检阅，全营里还仅存两名：有的已被提升，去了别的部队，而大部分已经战死。

检阅时，铁托甚为感动。他充满激情地说：“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刻，在最可怕的敌人的进攻下，我常常暗自思忖：‘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发动的起义，将在

贝尔格莱德胜利地结束！’这个伟大的日子现在已经来临。在我们中间，1941年开始战斗的人已寥寥无几。牺牲了的同志用生命奠定了自由的和人民希望的国家的基础。成千上万的人学习他们的榜样。一个人倒下去，十个人跟上来。光荣归于为解放南斯拉夫、为解放它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而牺牲的战士们！”

在为贝尔格莱德战役做准备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打响了解放马其顿的战役。11月之前，马其顿全境已告解放。

1945年2月，地中海司令、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来到贝尔格莱德。他与铁托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制定了南斯拉夫军队与盟军协同作战的计划。这时，德国在南斯拉夫有7个军和17个师，它们是：第十五山战军，第十五哥萨克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十军，第六十九军，第九十一军和第九十七军；第一哥萨克师，第二哥萨克师，第十五师，第四十一师，第一四师，第二十二师，第一八一师，第七党卫师，第三六九师，第三七三师，第三九二师，第二三七师，第一八八师，第四三八师，第一三八师，第十四鲁什尼克党卫师和斯特凡师。除陆军外，还有部分海军及警察部队。另外，伪军还有20个师。

这时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80万人，组成了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和第二、第

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九和第十师团。

1945年3月20日，南斯拉夫人民军对德军开始发起总攻。最先打响的是由佩塔·德拉普辛指挥的第四军。3月20日开始，该军突破德军利卡防线，解放了利卡和克罗地亚沿海地区，4月16日，遂把敌军赶至南斯拉夫与意大利旧边界一线。

4月16日至5月7日，第四军的机械化部队又进行了里耶卡战役。4月27日，敌人战线被突破，5月1日，解放的里雅斯特，敌九十七军被包围。5月7日，敌军投降，然后该部前出到卡林西亚。

5月9日，德国投降，但战争实际上打到15日。5月15日南斯拉夫全境解放。

战争结束了，现在，这样一个时机已经到来：铁托不仅可以恢复已经被破坏了的的东西，而且可以创造新的东西。对铁托来说，最危险的是半途而废。战争的胜利仅仅是个开端，现在面临的任务的艰难程度，几乎是想象不到的。铁托除了坚强的意志、高昂的士气和充沛的精力外，一无所有。过去几个月内，他走遍了全国。利卡已经夷为平地，那里的村庄在战争中烧毁了十几次。就是走上100公里也看不见一所没有倒塌的房舍。但另一方面，从人民中间奋发出了巨大的力量！各地都在要钉子，要木板。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修建房屋和学校。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铁路，

德国人几乎把这条全长450公里的铁路都犁平了。他们把枕木像一根根火柴那样拆了下来。铁路全线一片残破景象：两旁满是弯曲的铁轨、断了的枕木和被洗劫一空的车站。可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线通车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愿地日夜工作，直到第一列火车能够在南斯拉夫两个主要城市之间行驶。这是人民的品质，这种品质将帮助国家克服任何艰难，为国家的未来的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

在战后南共中央上层领导的决策中铁托本人保留了与他在战前和战时相同的权威和个人权力。铁托的大部分亲近同事经历战争而仍健在，但是伊凡·米鲁丁诺维奇于1945年乘船在多瑙河上触雷身亡。

在称为政治局的最核心的决策集团中，同铁托关系最密切的是由四五个人组成的小组，其成员因议题不同而有差异，但核心人物包括斯洛文尼亚人爱德华·卡德尔、塞尔维亚人莫萨·皮雅杰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以及门的内哥罗人密洛凡·吉拉斯。接近这个核心集团的还有克罗地亚人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斯洛文尼亚人博里斯·基德里奇以及马其顿问题专家门的内哥罗人伏克曼诺维奇。所有这些人都是战前的老共产党员，他们体现了国内各民族间的大致平衡。更细致的平衡则维持在人数多得多的党中央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讨论政策，就大量问题提出建议，但是在

此阶段总是把铁托的核心小组的重大决定作为最终决策来接受。有关建立政府和编制计划的方法的讨论是热烈的，争论得很激烈。特别是关于制定计划和继续保留私有土地的问题有过很多分歧意见。铁托总是鼓励讨论，但是决定一经作出，固执的反对意见便必须放弃。领导人已有实行这种共同工作方法的长期经验。大部分革命变革的基本原则他们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决定，其中很多项早在1943年的亚伊策反法西斯会议前就已决定。领导人一旦就战略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就必须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就战术问题作出决定，为此一周要开几次会议。他们是一个结合得很紧密的班子，铁托作为首脑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威，这在他最亲密的同事和范围更大的政府官员中都得到公认。政府官员都是受严格纪律约束的共产党员。

1945年，战时掌握全权的最高参谋部变为在新的国家管理政府的领导班子，这种转变无需多少调整，因为人员大体未动，党组织未变，政治局保持了权力的延续性。政治局的每个委员如同战时那样管一个方面。莫萨·皮雅杰继续从事立宪，即国家的政权和法律基础的制定。这是他从1943年起就已从事的工作。兰科维奇继续掌管极其重要的安全工作。他组织各种情报机构，反间谍机构和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为了保卫铁托和新的革命国家，残酷无情而卓有

成效。年复一年，他搜集国内一切重要人物的秘密情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最后被认为是危险的个人王国。吉拉斯成为在文学和宣传方面负特殊责任的副主席。卡德尔专门从事他战时就已开始的对外关系工作，处理日常外事，偶尔担任特殊出访使命。铁托本人则负责国际关系……协调整个班子的工作。但显然他无法过问在许多领域内同时进行的工作的实施细节。国内事务的琐事，只得委托别人。

这个班子，战后很快确定了南斯拉夫党的工作任务。首先是推进社会改革，以便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南斯拉夫学习苏联的榜样，进行了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这两项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

在抓社会改革的同时，直接抓经济建设。按照苏联的模式，南斯拉夫很快制定了五年计划。五年计划的宗旨，在于开发本国工业的潜力。这个计划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有极强的吸引力，因为它将带来新建工厂生产的商品，较高的生活水平，给工人以就业机会从而形成一个工业无产阶级，造就一批未来的共产党的精华。博里斯·基德里奇受命承担了落实计划的任务。为了使这个计划取得成功，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但未能坚持到它的成功：1953年他患白血病去世。

在巩固人民政权方面，最大的威胁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存在。内务部制订了彻底消灭“切特尼

克”武装、活捉米哈伊洛维奇的计划。

1944年开始，由于米哈伊洛维奇政治上的失败，“切特尼克”内部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在人民军解放塞尔维亚时，米哈伊洛维奇从塞尔维亚撤到了波斯尼亚中部。在这里，他的残部距德军30公里驻扎，实际上是希望继续得到德国人的掩护。

德国人保护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左翼。当1945年4月南斯拉夫军队开始向德国人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德军在希雷姆被击退时，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左侧失掉掩护，这时，他决定带着几千人逃到塞尔维亚去。

他从波斯尼亚北部出发向南，然后转而向东，以便躲开博斯纳河。他的这一行动本是可能完成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游击队都投入了对德国人的最后战斗之中。

但是，他的部队士气低落，没有粮食吃。5月12日，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被对付他们的国民警卫队和地方民兵拦腰斩断。他率领着残部到了接近苏捷斯卡河的地方。这里是1943年同德国和意大利人在第五次攻势中作过战的有名的地段。决战开始了，“切特尼克”防线被突破。5月13日的凌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受到攻击。他在这里丢掉了全部电台、自己的行李、帆布背包，甚至还有

他的望远镜。

这次战斗以后，米哈伊洛维奇身边仅有100人了。他企图带着他们向北逃走。1945年5月19日至20日的夜里，他遭到游击队的伏击，损失40人。接下来，他又一次遭到伏击，最后只剩下17人了。

从1945年5月到1946年3月，追捕小组几次都会毫不费力地击毙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但是他们奉有严格的命令：要活捉他。捉拿米哈伊洛维奇的包围圈愈来愈小。这时，他自己也受不住了。一天晚上，他从洞里出来，走进农民的房里，追捕小组正埋伏在那里。追捕人员的突然出现，使米哈伊洛维奇来不及进行反抗。他被铐了起来，大家发现，他脏得可怕，也快要饿死了。

米哈伊洛维奇被用汽车解往贝尔格莱德。第一个到监狱里看他的是兰科维奇。米哈伊洛维奇凝视一会后说道：“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你！”

“很可能，”兰科维奇回答，“1941年秋，当铁托同志派我再次设法和你谈判，并请你同占领者作斗争时，我到过你在腊夫纳戈拉的司令部。在祖国最不幸的日子里，你变成了祖国的最坏的卖国贼。”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一声没吭。米哈伊洛维奇要求允许洗个澡并要求得到干净的内衣，他尤其要求

提供较好的食品。所有这些要求都被答应了。

米哈伊洛维奇被捉到那天，兰科维奇拍电报给前往波兰正在路上的铁托：“计划完成了。”

铁托到华沙以后，在电话里告诉斯大林，米哈伊洛维奇已经被捉住了。斯大林听到这个消息表示满意。但他立即责备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南斯拉夫的代表，说他们对捉拿米哈伊洛维奇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

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南斯拉夫领导人季莫费耶夫垂头丧气地去见兰科维奇，抱怨说，斯大林狠狠地申斥了他们一顿，说应该把捉拿米哈伊洛维奇的计划告诉他们。兰科维奇回答说：“主要的问题是德拉扎已被捉住了。”

1946年7月，在托普契德公园的警卫大厅里，开始了对米哈伊洛维奇的审讯，他为自己辩护，不承认检察官所起诉的所有罪行。有关他的档案被带到法庭上来，其中有他亲手写的若干作战命令。这些命令表明了他如何同占领者合作，表明他的部队，首先同意意大利人，以后又同德国人一起参加了对游击队的作战。他无法抵赖这一切。

审判公开进行。很多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到现场进行了采访，电台广播了审判的全部情况。前来作证的人数以百计，其中有被杀害的青年人的母亲，有被集体屠杀的受害者留下的孤儿。德拉扎·米哈伊洛维

奇被判死刑。

第四方面的工作，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谋求外部的援助。南斯拉夫经过努力，成功地得到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这一援助对帮助南斯拉夫渡过战后的难关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给予的救济金达4亿美元。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当初，救济署提出，这些救济物资应由救济署的工作人员直接发给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敏感问题，于是，提出救济物资由南斯拉夫政府自己掌握，由各级人民委员会下发，否则，南斯拉夫可以不要这些救济援助。

救济署做了让步，答应了南斯拉夫的要求。救济署署长菲奥雷略·拉瓜迪亚访问了南斯拉夫，铁托亲自陪他视察了利卡等地区，拉瓜迪亚给了铁托良好的印象。

当初，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的里雅斯特的冲突，以及战后南斯拉夫明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英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南斯拉夫与美国的关系也不妙。1946年，美国不顾南斯拉夫的抗议，飞机侵入南斯拉夫领空几百架次。8月初，南斯拉夫方面对入侵的美机进行反击，致使一架飞机被迫降，另一架飞机被击落，飞行员毙命。

在这种情况下，铁托只好把求援的希望寄于莫斯

科。1946年春，铁托由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博里斯·基德里奇、科查·波波维奇及其他人陪同到达莫斯科。这是铁托继1945年去莫斯科签订友好条约之后又一次到苏联进行访问。

5月27日晚，铁托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陪同前往的还有兰科维奇、基德里奇、波波维奇等。铁托到达后，斯大林在会议室里接见了铁托一行。斯大林同客人们一一握手，同时打量每一个人。斯大林转向莫洛托夫，对他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瞧，多么英俊、健壮的人们，一个强大的民族！”这次铁托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同斯大林会晤了多次。

铁托1946年访苏之后，南苏关系暖暖寒寒，在微妙之中发展变化。苏联对南斯拉夫经济援助的问题，变成马拉松谈判，南斯拉夫人的感觉是苏联口惠而实不至。这期间斯大林接受了铁托的建议，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在名单上，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排到了首位，而且把情报局的总部设到了贝尔格莱德。尽管南斯拉夫已经意识到，苏联对情报局的设想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想法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苏联的上述举动，不能不看做是对铁托的器重。当然，成立情报局，对南斯拉夫来说，实际上成为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一个枷锁。而这却是当初人们难以预计的。在战后的和会上，苏联也是唯一支持南斯拉夫要求的大国，尽

管苏联并不是凡事都支持南斯拉夫。

后来，经援谈判谈成了，物资贷款数额确定了，苏联专家陆续进入各个领域，贸易也在进行，联合股份公司的建立也有了进展。但是，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随着这些领域工作的推进，另一方面的问题也突出出来。南斯拉夫人发现，在经济上自己与苏联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各个工作领域中，南斯拉夫人与苏联专家之间，出现了数不尽的矛盾和摩擦。南斯拉夫人感觉苏联人以“恩人”和“权威”自居，有的甚至当了“太上皇”。南斯拉夫人开始不满，而且在某些场合公开表示了自己的这种不满。

这期间，巴尔干和东欧的形势也出现了变化。巴尔干和东欧某些国家出现了独立倾向，铁托的威信明显提高，影响明显增强。

在东西方冷战开始的时期，斯大林绝不允许这种倾向抬头。他必须牢牢控制东欧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国家，以免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946年到1948年，斯大林不断地把南斯拉夫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软硬兼施，企图磨平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不驯服的棱角。压而不服，不服则再压，这样，南苏关系便越来越紧张。

1948年1月，吉拉斯作为南共代表被召至莫

斯科就阿尔巴尼亚问题听从斯大林的“训令”。2月份，吉拉斯还没有回国，卡德尔又被召到莫斯科。他和吉拉斯及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等一起，就巴尔干及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听了斯大林更为严厉的训斥。

随后，罗马尼亚下令从一切宣传橱窗里摘除了铁托的肖像。在地拉那举行的苏联红军建军节的庆祝宴会上，苏联代办在回答南斯拉夫使节的祝酒提议时说：“除非铁托赞成民主集团之间的团结，我才为他干杯。”

2月底，在南斯拉夫提出与苏联续签贸易协定时，莫斯科通知南斯拉夫，谈判代表没有必要到苏联来了。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再也不能对这一切“等闲视之”了。3月1日，南共中央举行全会。会议有四项议程：一、由卡德尔、吉拉斯和基德里奇报告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二、五年计划执行中的问题；三、军队和军事工业问题；四、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问题。

铁托发言指出苏联政府废除协定的目的是对南斯拉夫施加经济压力，使南斯拉夫屈服。但是，他指出，南斯拉夫的独立更为重要。

大家决定，会议讨论的事项一律要绝对保密，一个字也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因为这件事，特别是苏联经济压力的问题，一经传出，后果会非常严重。当时，南斯拉夫根本没有真正认识到，重大的事件已悄然走

来。3月18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使团团长沙尔斯科夫将军通知科查·波波维奇，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已下令从南斯拉夫撤离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因为他们“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受到了敌对的待遇”。

一天以后，即3月19日，苏联大使馆代办阿米亚尼诺夫要求铁托接见，并向铁托宣读了一份苏联命令从南斯拉夫撤离一切文职专家的电报。

这些决定雷厉风行地执行了。苏联专家纷纷报告他们已接到了撤离令。从此之后，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最后完全破裂。

1948年5月19日，苏共通知南共，让南共参加情报局会议，讨论南共领导的“错误问题”。这样的会议南共自然不去参加。第二天，南共便将不参加会议的决定通知了苏方。

情报局会议原定在5月份召开。由于南共拒绝参加，苏共决定延期举行会议，以便等南共“改变主意”。苏共于是又在6月19日向南共发出邀请南共参加会议的通知。南共的主意不打算改变。6月20日，南共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了情报局。

这一次，情报局不想再等下去了。随后，情报局会议在南共缺席的情况下，在布加勒斯特召开，6月28日通过了开除南共的决议。

7月21日，南斯拉夫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天，总共有2344名代表聚集在贝尔格莱德近郊托普契德公园古老的御林军营的大厅里，这些代表是从全国46.8万党员中选出的。代表中，有一半以上参加了1941年开始的反侵略战争。

会议进行实况转播，全南斯拉夫人都坐在收音机旁，了解大会进展情况。会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肖像，铁托的画像则置于中央。铁托主持了大会并发表了长篇讲话。

大会进行了6天。最后一天是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投票是无记名的，但公开宣布了每个人的得票数。当天，有2323名代表参加了投票，半夜得出了选举结果。

铁托得2318票。这时，大厅里一片欢呼声。随即，会场上有人带头，唱起了颂扬铁托的歌。

会议的结果无疑使苏联领导人大失所望。苏联人所指望的“健康力量”“销声匿迹”，而他们所咒骂的“铁托叛徒集团”却团结得“钢铁一般”。西方舆论也在转变，他们认为在南斯拉夫“出现了奇迹”。

第五章 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1949年，铁托的新年讲话经由电台发表。它的宗旨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他说：\$

我们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又轻松过呢？我们已经习惯于困难了，困难不可能使我们动摇，更谈不上压垮我们了。我们过去相信会取得胜利，当整个欧洲笼罩在法西斯的阴影下，当相当一部分人丧失了信心，开始认为恶势力的胜利是长久的时候，我们进行了斗争。我们今天也不动摇。\$

为了对付苏联的颠覆，以兰科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保安机关，几乎全部破获了苏联在南斯拉夫建立的秘密组织，并将它们的成员抓了起来。这涉及到苏联侨民，其中还有不少白俄。对此，苏联向南斯拉夫多次提出抗议，而事情发展到秋天，苏联便向南斯拉夫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照会。

照会是清晨3点钟由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送交南斯拉夫外交部的。”外长卡德尔看了照会后，立即打电话把吉拉斯、基德里奇和泰波召到自己的办公室。

当时，铁托正在布里俄尼。卡德尔立即把照会内容告诉了铁托。照会对南斯拉夫逮捕苏联侨民的做法

进行了猛烈攻击。

照会最后说：“看来，南斯拉夫政府打算继续非人道地对待苏联公民，继续进行违法的逮捕和殴打，继续侮辱苏联公民。

“看来，南斯拉夫政府不打算让罪犯——法西斯做法的执行者承受罪责。

“如果这符合事实的话，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声明，对于这样的事态，它将不会无动于衷，它将不得不采取为维护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的权益、为教训超越一切界限的法西斯暴徒所必需的其他更为有效的手段。”

铁托对照会谈了看法。他指出，局势十分严重。他提到，几天前就有消息说苏军正在南斯拉夫的邻国集结。

卡德尔和吉拉斯、基德里奇以及泰波对照会进行研究后，决定认真进行军事准备。同时决定从伏伊伏丁那向内地，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疏散档案、食品仓库以及工厂。

铁托批准了他们的安排，并指示在北方组织军事演习。对舆论也做了相应的布置，其中要各家报纸和电台注意按政府口径进行报道，以免给苏联的军事进攻提供口实。当时担任新闻局长的弗拉吉米·德迪耶尔瞪大了眼睛，生怕自己管辖的部门出了问题。但是，

魔鬼从来是不安息的。9月6日,《文学报》登出一篇文章,题目是《克雷洛夫或者伊索》。德迪耶尔看罢文章,连叫不妙。

从1949年5月开始,在东欧各国进行了“铁托分子”的法庭诉讼,阿尔巴尼亚的科奇·佐治、匈牙利的拉伊克·拉斯洛、保加利亚的特拉伊奇·科斯托夫、捷克斯洛伐克的鲁道夫·斯兰斯基、弗拉迪米尔·克莱门蒂斯等一些“铁托分子”大多被无情地从肉体上消灭了。

从1949年9月开始,苏联及东欧各国相继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9月28日,苏联行动;9月30日,波兰、匈牙利行动;10月1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行动;10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行动。

9月,苏联向南斯拉夫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而且在北部大兵压境。武装挑衅事件不断,谁晓得哪一种偶然事件不会酿成大祸?而在巴尔干,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不乏实例的。而从1948年7月1日到1949年9月1日,这类挑衅事件竟达219次之多!

1949年11月情报局又公布了一项决议,决议中有这样的话:\$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铁托集团已完全蜕化为法西

斯主义并投入了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据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

（1）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吉拉斯、皮雅杰……伏克曼诺维奇、科查·波波维奇、基德里奇……韦莱比特……等人组成的间谍集团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敌人。

（2）这个间谍集团不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意志，而是代表英美帝国主义的意志，从而背叛了国家的利益，废弃了南斯拉夫的政治主权和经济独立。\$

这个决议还特别指出，“为反对铁托集团一伙被雇佣的特务和刽子手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义务”。

这一切都说明，南斯拉夫又一次处在包围中。突围成了铁托革命生活的重要内容，而突围，也成了铁托的拿手好戏。他有突围的决心和毅力，也练就了突破包围的本领。经过长时间的酝酿，铁托选定了突围的方向。

1948年，在铁托受到包围的时候，东西方的冷战已经开始。铁托分析形势得出结论：对南斯拉夫来说，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及其东欧盟国。西方是仇视共产主义的，但在东西方对抗加剧时，凭借南斯拉夫优越的地理位置，凭借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形成的微妙关系，南斯拉夫可以争取到西方某种程度的支持，

借以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铁托的出发点是，利用外交手段，使南斯拉夫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南斯拉夫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一国问题，而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

这样做当然是有风险的，而且难度很大，因为既利用他人而又避免至少是减弱被他人利用，需要高超的斗争艺术，更何况自己要利用的对手异常老练、狡猾而强大。最敏感的问题是主权问题。维护主权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不能前门赶出豺狼，后门迎入虎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当敏感的。

南斯拉夫决定，在1949年联合国大会上竞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南斯拉夫考虑到，这不但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竞选活动，争取友谊和支持。

这一行动直接关系到苏联的利益，因此，苏联采取多种手段来阻止南斯拉夫的当选。其中的一个办法，是它推荐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竞选。

南斯拉夫人为争取中选花了大的力气。可捷克人由于各种原因自身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因此，也没有为此开展多少活动。

10月20日是选举的日子，非常任理事国须2/3的多数票当选。第一轮表决，厄瓜多尔得58票，印度得56票，南斯拉夫得37票，捷克斯洛伐克得

20票。南斯拉夫还差1票不够2/3多数。第二轮投票结果，南斯拉夫得39票，捷克斯洛伐克得19票。南斯拉夫当选！

南斯拉夫人个个兴高采烈。在会场里，南斯拉夫驻联合国大使萨维察·科萨诺维奇来到弗拉吉米尔·德迪耶尔的身边。他们太激动了。大使和德迪耶尔拥抱在一起。

苏联人对于这一结果自然是不满的，它做出了反应，但是，它的做法是不巧妙的。

南斯拉夫在参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竞选活动中，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说明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并不是不能打开的。

贸易和经援谈判取得了进展。铁托在与西方就此进行谈判时，明确提出，西方的援助必须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否则，他可以不接受这些援助。西方国家在谈判中表示了这方面的承诺。莫斯科自然强烈反对铁托的行为。他们不断地散布出种种谣言，破坏南斯拉夫对西方的实质接触，他们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是“铁托只有向帝国主义乞讨才能过日子”，“收买南斯拉夫只需1亿美元就够了”。铁托的回答是：对南斯拉夫，是谁也收买不了的。铁托在打开与西方的关系后，经济上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从1949年到1959年，10年当中，南斯

拉夫获得价值约 2.4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贷款、购置重工业设备的信贷，发展农业需要的肥料、种子和牲畜，小麦、面粉，医药用品，还有军事装备、军用飞机、舰只和商用船只。美国、英国等还派出了各类专家。随着经济往来的增多，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也发展起来。1953 年，铁托实现了对英国的访问。英国热情隆重地欢迎了铁托，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与铁托共进了午餐。在访英期间，记者向铁托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铁托看来，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呢，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好？对此，铁托以平和的语调回答道：

“你们认为你们的制度好些，我们则认为我们的制度好些。但是，这必须留待未来作出判断，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哪种制度在实践中更好；我们至今还没有机会来加以证实。”

尽量改善同某些邻国之间的关系，是铁托打破包围的重要举措。1949 年开始，铁托决定停止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支持，从而改善了与希腊的关系。随后，又与土耳其政府商讨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措施。在此基础上，与希腊、土耳其签订了巴尔干公约，从而获得了一方的安全。

北部边界是南斯拉夫最危险的地段，它必须时刻盯住匈牙利方向。在此情况下，它与北方近邻奥地利

改善关系实属必要。为此，南斯拉夫忍痛将它在卡林西亚要求得到的领土全部让与奥地利。这样，两国关系随之改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

与意大利一直存在着领土争端。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悬而未决。的里雅斯特临近的领土，曾分成A、B两区，A区拟定归意大利，B区拟定归南斯拉夫，但因南不接受而实际搁置。由此，两国关系微妙。1952年，盟国军管政府在未与南斯拉夫磋商的情况下，即开始将A区的军事和民政事务移交给意大利人进行管理。这样下去，南斯拉夫便失去了就此地的主权问题进一步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铁托绝不示弱。他公开声明，南斯拉夫虽然弱小，但它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惜一战。这样，意大利方面同意将此问题谈判解决。

铁托先胜了一个回合。在随后进行的谈判中，铁托又作了让步。最后，领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南斯拉夫放弃了对的里雅斯特及其腹地的要求，但得以将B区的界限向A区推移了相当的距离。另外，还得到了它所要求的哥利西亚的部分土地。这样，南斯拉夫与意大利的关系又获得了迅速改善，不但使西部边界成了安全的边界，而且还与意大利成为重要贸易伙伴。

经过这番奋斗，铁托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南斯拉夫的问题，不再是南斯拉夫一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

局中的问题。铁托可以放心地说，苏联是不能轻易对南斯拉夫动手了。

1953年，斯大林逝世。铁托在注意地观察着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他发现，那里的变化喜人。最后，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变化的一个成果。1955年，也就是斯大林逝世两年后，赫鲁晓夫率团抵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赫鲁晓夫于5月末到达贝尔格莱德机场。赫鲁晓夫不是代表团团长，团长是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但赫鲁晓夫叫人看来主宰一切。在机场上，他手舞足蹈，插科打诨，努力给人一种庆祝兄弟情谊的印象。铁托的表情与赫鲁晓夫形成鲜明对比。他表情严肃，面无表情。

在双方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代表苏联向铁托道了歉。对此，南斯拉夫方面并没有加以原谅。原因是当时赫鲁晓夫把诽谤南斯拉夫的责任归结于贝利亚，而回避提到斯大林本人。

双方会谈的结果，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后来被人称为《贝尔格莱德宣言》。声明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双方一致同意“国内改革或社会制度差别的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对于声明，铁托坚持由双方政府首脑签署而不由党的领导人签署。

赫鲁晓夫的来访，是铁托的巨大胜利，它又是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一个阶段的标志，因为这是苏联第一次承认各国共产党有权按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标志着苏联凌驾于其他共产党之上的权力的终结。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南斯拉夫彻底打破包围这一狭隘意义。

在1953年，南斯拉夫进行普选，铁托当选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这时，南斯拉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孤立状态，但是包围并没有被完全打破，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还严重存在。铁托与他的战友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行动上不敢有半点怠慢。

铁托对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所有新闻稿都不放过。新闻稿登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世界主要通讯社的新闻。铁托指示他的秘书，不要在消息上标了任何记号，而由他从头到尾看一遍。《泰晤士报》、《经济学家》、《新政治家与民族》、《论坛报》、《纽约时报》欧洲版、《纽约先驱论坛报》欧洲版、《外交季刊》、《新苏黎世报》和莫斯科的《真理报》都按时送到铁托案前。铁托读得很快。铁托一边看报一边抽烟。他每天抽20支。

看完报，铁托接着阅读信件。来自国内外的信件是很多的。秘书要拆开所有的信件。每天上午，秘书和他的助手们把所有信件内容摘要列成一个单子。这

些摘要用打字机打在红色小卡片上，然后将纸片卡在原信上，铁托看信后用蓝铅笔将如何处理的意见写在信纸的一角。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有时要花费整整一个小时。多数的信是对当局的某些措施的抱怨。这些抱怨信件都转给铁托的一位特别秘书，由他查明抱怨有理由与否，他要求政府机关或其他组织部门提供更多的材料，然后向铁托提出一个情况报告，看申请能否成立。大多数情况下，或者90%的情况下，铁托对申请作出了肯定的答复。有各式各样的请求。例如，在南斯拉夫有个习惯，生第9个孩子的家庭要请铁托当孩子的教父。有牺牲了的游击队员的家庭，抱怨他们的抚恤金的问题没有解决。许多的信是抱怨他们从房子里被赶了出来。铁托在胆囊开刀之前收到许多信，特别是从农村寄来的，老妇们写信来，提供可治疗这种病的各种妙方。一批特别信件是工人们写的叙述他们发明创造的。偶而也有出奇的幻想。例如，一个农民，在战时于1944年在德国人进攻之后曾领着最高司令部和铁托穿过德瓦尔河上的一个森林。他写信给铁托，说他发现了“永动机”。铁托立即回他一封长信，告诉他“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他最好把精力用到发现有用的事物上去。

铁托看完报纸和信件后就研究国家的问题。他批阅驻在国外的南斯拉夫代表的电报，然后研究起草过

程中的各项法案。他通常也在上午召见各部部长，同他们讨论他们正在做的一些重大事情。他还接见国内的代表团和个人，一年之内要会见几千人。这些访问者包括他的老朋友和亲戚。他们通常一年一度地来铁托这里，住上一半天，得到一些礼物然后离去。铁托习惯于各地视察。他每年访问6个共和国中的一个，参加工会大会或退伍军人大会，或起义周年纪念会。他还访问工厂、合作农场和造船厂等。他往往冷不防地来到了，停两三个钟头，同许多人谈话。铁托尤其不忘记战斗过的地区。

铁托喜欢体育、音乐、绘画，还喜欢宫殿似的建筑。每逢星期六，铁托往往出城打猎。铁托的枪法很好，但是他很少真正打猎，倒是更喜欢在旷野走走。铁托虽然是个勤奋的工作者，但他在白天总要挤出一点时间休息。他的晚餐很简单，不外乎酸奶酪、法兰克福香肠之类。晚餐后铁托有时看看电影，他比较喜欢轻松快活的影片，但有时候也欣赏一下历史片和纪录片。他如果不看电影，就在晚间请些客人来。他最常请的客人有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铁托是个善于社交的人。由于他好客，座上常有客人。铁托也希图把政治与私生活区分开来。

自从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之后，国内经济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困难。在农村，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农

业合作社与集体农庄，看来并没有给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带来多大积极效果。相反，农村矛盾越来越多，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面对现实，铁托采取了大胆的做法：解散农业合作社。农民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工厂中的情况也不妙。工厂，尤其是国营工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农业合作社可以解散，把土地分回给农民。但工厂却不能解体，把厂房和工具分给工人。

铁托和他的战友们对此动了一番脑子，最后想出了“工人自治”的概念，并把它付诸实践。“自治”的思想，最初是由吉拉斯和基德里奇提出来的。它一旦被提出，先是受到卡德尔的肯定。随后，便得到铁托的首肯。

“工人自治”是通过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选举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权，是直接对工厂进行管理，负责工厂里从生产计划到利润分配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从全国来讲，“自治制”有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浅至深的发展过程。1950年，“自治”还限于工矿和交通运输部门。同年6月，颁布《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最高经济联合基本法》，规定把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由直接生产者进行管理。形式

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这种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1952年，颁布《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改变国家的计划体制，从此，国家不再对企业下达统一的计划，而是提出计划比例和国家指标，供企业参考。企业的发展计划自主制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后，自行决定利润的分配。取消固定工资，企业人员多劳多得。1953年，颁布《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 and 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根本法》，把自治原则扩大到了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活动领域和政治生活之中，使企业自治发展成为社会自治。1964年，南斯拉夫取消了国家投资基金，改由银行贷款，这样，便取消了扩大再生产的国家控制权，而把这一权力给予了企业。70年代，又把“联合劳动”的原则纳入自治制，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这一制度。

在一个时期，自治制度曾被看做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的一大象征，为世人所瞩目。

同时，不结盟也成了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的另一大象征，为世人所瞩目。在全球两个军事集团对峙日益加剧、集团政治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像南斯拉夫这样既不想钻进东方集团、又不想加入西方集团的中小国家的作用，是铁托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最终找到了出路。这就是不结盟概念的提出和实践。

1956年，铁托把在非洲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人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对亚洲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到他在布里俄尼岛的住处，三人一起探讨了在国际关系中推行“积极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可能性的问题。这是“不结盟”思想的萌芽。这之后，由他倡导，与纳赛尔、尼赫鲁及亚非国家其他一些领导人，如印尼的苏加诺、加纳的恩克鲁马等一起，以积极的和平共处为纲领，把一些不参加集团的国家组织在了一起。这是不结盟实践的重大一步。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首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3个国家。1964年，第二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在开罗召开，参加会议的增加到47个。到1986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已发展到101个。

为了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从1956年开始，铁托不断在国外奔波。到1968年止，十几年当中，他先后访问了30余个国家。当初，他乘坐自己的“海鸥”号游船出访。后来，访问的国家越来越远，他不得不改坐飞机，尽管他坐飞机总是感到不适。他每到一处，都受到被访国家的隆重接待。

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和铁托的国际声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影响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贝尔格莱德；

同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到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1971年，苏联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访问了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中小国家，能够把这些人物召到自己的首都，不能不归功于不结盟的创举。这一切都是铁托的成功。无疑，他为自己、为党、为国家的成功而高兴。但铁托也有苦痛。在这些日子里，铁托生了几场病，动了手术。他必须与折磨他的疾病进行斗争。另外，他的战友，也一个个离他而去：他们有的病逝与他永别，有的由于种种原因与他分手。这对铁托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他必须与这些事变带来的痛苦进行斗争。

最早与铁托分手的是密洛凡·吉拉斯。50年代初，吉拉斯开始撰写文章，对党内存在的健康现象，如官员的特权、缺乏民主等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批判。而后来发展的势头说明，他的批判矛头对准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吉拉斯曾狂热地信仰社会主义。我们在本书第二十四章中曾经谈到他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第一次去苏联时的精神状态。他当时狂热地崇拜苏联、崇拜斯大林。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苏联、对社会主义，由怀疑发展到否定。他的文章很带有煽动性。铁托等曾多次对吉拉斯进行规劝。但吉拉斯决心与铁托等分道扬镳。在这种情况下，铁托遂与

吉拉斯分手。

1954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中央特别会议决定，撤销吉拉斯党内外一切职务。3月，他被开除出党，后被判刑。他写了《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不完美的社会》等著作。与吉拉斯一起被清除的，还有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与他来往过密的人也受到了株连。弗拉吉米尔·德迪耶尔便因此去职。

1966年，铁托又不得不与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分手。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直主管安全工作。后期，他的权力日益明显地扩大。到60年代，他在党内的地位超过了卡德尔。人们认为他将成为铁托的接班人。

但1966年6月28日，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举行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中央委员们被从贝尔格莱德用飞机分批送到岛上。军队也进行了调动。召开会议是要审查对兰科维奇的严重指控。他被指控反对党的改革政策，在全国依靠国家安全体系树立个人的权势。他还被指控在党的高层领导甚至铁托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卡德尔在会前向铁托证实，他发现，他的电话早已被窃听。铁托听了便说：“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卡德尔回答说：“我以为是干的。”这话弄得铁托哭笑不得。兰科维奇被开除出党，但他避免了

坐牢之苦。因为铁托不同意把自己的这位老同事投入监牢。

除这些事变外，铁托在国内也遇到了另外一些麻烦。最主要的是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但是，铁托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凭借自己多年来树立起来的个人权威，仍然可以牢牢地控制着局势。

1980年，铁托身染重病，经过两次手术、4个月的医治，他在卢布尔雅那病逝，享年88岁。

1980年5月8日，他的遗体安葬于贝尔格莱德住所的花园之内。来自10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他的葬礼。代表团中有35位国家元首，3位君主，8位副总统，24位政府总理。

铁托逝世时已年高88岁。在他去世时，他的妻子还很年轻。她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妻子。

铁托有过四个妻子。他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妻子结了婚，同第二个妻子和第三个妻子是同居关系。这四位妇女在他的生活中起了重要而又不同的作用，但是，没有哪一个对他的生活施加过任何重大影响，更不用说对他的决策施加过任何影响了。

1920年9月，约瑟夫·布罗兹从苏联回国，陪同他回国的是他年轻而美丽的俄国妻子。她后来去了俄国，并且改嫁了。

铁托第二个妻子是赫尔塔·哈斯，她是斯洛文尼

亚马里博尔的一个大学生。他们是在1937年春天铁托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相遇的。赫尔塔是一个性情温柔、体态匀称的黑发女郎，她流露出一种内在的热情，她深深地爱慕着铁托。她是一个真心诚意、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大战结束后，她同另一个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尽管当她谈到铁托时隐约地流露出不满，但她从不让人忘记他是她儿子的父亲，而且从不说他一句坏话。她总是抑制自己的感情。

铁托于1941年春天同赫尔塔分手，当时她生了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之后正在养身体，并照看孩子。与此同时，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从贝尔格莱德被派往萨格勒布参加秘密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她的名字叫达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可是在大战期间，人们都叫她兹登卡。无线电训练班是在萨格勒布的一所公寓里举办的，铁托经常去那里。他和兹登卡就是这样互相认识的。南斯拉夫被占领之后，铁托和政治局回到贝尔格莱德，那时兹登卡和铁托已经是形影不离了。事实上，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都呆在一起。兹登卡当铁托的秘书，虽然她的组织能力不是特别强，她也并不是特别勤奋。她不太勇敢，特别容易紧张和惊慌失措。但兹登卡长得特别漂亮。到1946年，铁托和约婉卡之间大概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亲密关系。约婉卡在认识他之前，未有过恋人。她23岁，1923年

生，铁托 55 岁。约婉卡很快就受到注意，不仅是由于她的容貌仪态，而且也由于无论铁托走到哪里，或者在哪里停留，她总是在一边出现。

约婉卡是一个动人的美人，是一个身体健壮的塞尔维亚美女，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她虽然不会卖弄风情，却不乏女性的妩媚。她的妩媚是内含的。她像一个修女，或者像一个为了丈夫而发誓要献出一生的农妇。因为她总是不离职守，她经常是穿一身军官制服，那时，她身材苗条，配上束紧腰带的制服，就更显得苗条了。她有一对乌亮的大眼睛，显示了耐性、关怀和一片忠诚，又有细嫩的面颊衬托着。但是，约婉卡命运的悲剧是铁托最后同她决裂，在他 85 岁高龄时莫名其妙地同她分居了。

铁托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